



英雄巨像千尊少 皇帝  
新衣半件多

書名：中國影帝溫家寶

China's Best Actor:  
Wen Jiabao

作者：余杰

序：鮑彤

頁數：378

出版：香港 2010 年 8 月  
16 日

經銷：田園書屋

電話：852-2385-8031

ISBN

978-988-19430-2-6

定價：118 港幣

Yu Jie, author of “China’s Best Actor: Wen Jiabao,” has been working on this book for five years. It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that analyze and comment on government policy in foreign affairs, economics, education,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during the Wen Jiabao premiership. Although the author based his research on material publically available in the form of official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reports, his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reflect the conscience, courage and knowledge of a truly independent thinker. Yu Jie sees the Hu Jintao - Wen Jiabao partnership as akin to the Mao Zedong - Zhou Enlai partnership, and both as merely a continuation of a political tradition that goes back two thousand years in China’s history: rule by the emperor and his top minister. “China’s Best Actor: Wen Jiabao” by Yu Jie will be released in Hong Kong on 16 August 2010 (in Chinese).

## 內容簡介

作家余杰在五年前便開始撰寫《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對溫家寶政府兩屆任期的外交、經濟、文宣、教育、民生等諸多政策作深入的分析與評論。本書所引用之素材，均來自中國官方報道及國際權威媒體，但其分析與評述，全都出自一名獨立知識分子的心、勇氣與學識，所謂“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作者認為，“胡溫”之一體化，如同“毛周”之一體化，是中國兩千年來“君相共治”的政治傳統的延續。

### 作者簡介

余杰，一九七三年生於四川成都；北京大學文學碩士；一九九八年，其部分作品結集為處女作《火與冰》出版，同年，該作品被“席殊讀書俱樂部”評為“十大好書”（文學類）之一，被視為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批評立場回歸的標誌；二零零零年，《為自由而戰》獲《亞洲週刊》（英文版）“年度最尖銳評論獎”；二零零二年，獲紐約萬人傑基金會之“萬人傑文化新聞獎”；二零零六年，長篇小說《香草山》獲香港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基金會之“年度文藝獎”；先後受邀歐美及港台數十所大學和學術機構任訪問學者。

余杰是少數敢於說真話的中國作家之一，也是一名關注言論自由、公民權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其公共性的寫作以及在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領域的活動，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 虚拟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

### —推薦余杰作品《中國影帝溫家寶》

作者：鮑彤

中国的公民之所以关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千家万户对领导都有所求——请求领导过问拖欠的工钱，请求领导制止官商勾结的暴力拆迁，请求领导把自己党内的腐败“领导”好，请求领导别再“领导”老百姓的事，别再管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哪些网络必须封，等等。

作家余杰写作和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见图），无非是批评领导，无非是对领导抱有希望，无非是想知道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正视而不回避摆在他们面前的、非解决不可的重大社会问题。有没有决心从善如流，实施宪法，使中国在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方面获得实质性、制度性的进步？如果对领导绝望，还会浪费笔墨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些批评的言论，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和要求。我看这种情绪和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到底是共产党为实现理想而建立，还是理想为解释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存在？虚幻与现实，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到了公元二〇一〇年，竟然谁也说不清楚了。

但据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面党的领导是“公仆”，所以连斯大林也认为：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家常便饭，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却是难上加难的大难题。斯大林的话对中国显然没有约束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特色，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与众不同，即便如此，查来查去，中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都没有说过公民批评不得党国领导人。

六十年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九五三年出过一个“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事件：一位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主义者，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中共中央发觉后，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此事被立即通报全国，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倾听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不可因身居高位而批评不得。

## 简介及序言

现在流行唱红打黑。正是毛泽东本人，在七大会场上，请求大会批准，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须知有无“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真共产党和假共产党的标志。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真；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假。

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

《中国影帝温家宝》不能在大陆出版，准备到香港出，但是作家受到警告，香港也不许出。警方的逻辑是，领导人不是普通人，批评领导人就会成为很严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判重刑。

警方的逻辑是现实的逻辑，但这是小题大做，起码是帮倒忙；说得严肃一点，是替和谐开倒车；用法律语言来说，这是非法的、违宪的。我希望警方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现在还来得及。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对公民的批评，需要党国领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不着紧张，用不着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来「维稳」。

我很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因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日子。为了解决矛盾，首先需要指出矛盾。二百多年前，安徒生用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向欧洲人指出了矛盾。现在同样需要有人向中国人指出矛盾。余杰先生作了勇敢的尝试，这本书也将因此成为检验中国的药剂。如果从此以后，言者真的无罪，党国领导、省市领导、县区领导、乡镇领导，真的成为公民有权批评的对象，

公民真的有了批评任何官员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 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自序

### 战胜恐惧的“萨米亚特”式写作——兼论我为何批评温家宝

#### （《中国影帝温家宝》自序）

如果放弃自由，我将日渐衰弱。那些可以出卖的灵魂是骚动和黑暗的。对任何事都不能撒谎，否则四分之三真相后便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乔治·康拉德

#### 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二零零三年春，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零距离接触到美国的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这才大吃一惊：几乎九成以上的政治类评论都在尖锐地批评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分支。恶搞总统的漫画触目可见，如果仅仅从媒体上了解美国总统的话，一定会认定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穷凶极恶的大坏蛋。我曾经读过旅美作家林达写的一本名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的书，看来，大部分美国人不仅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甚至认为总统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个总统是他们自己用选票选举出来的），正如自己亦贵为总统的里根的那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就是问题的所在。”而同样也是大家批评甚至恶搞的对象的小布什，也

## 简介及序言

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里，批评政府、批评国家元首和行政首长，是公民及知识分子的权利与天职。接受公众的批评甚至“谩骂”，也是所有的从政者首先需要修炼的一项“基本功”——如果没有这种心理素质，就不要参加这场游戏。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说过：“自由的舆论与政府相比更为重要，宁可没有政府有自由的报纸，也不能没有自由的报纸而有政府。”在我看来，这就是两百多年来美国成为繁荣而富强的国度，而且从未发生过一次政变的原因之一。一个任由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民主而自信政府，其稳定是不言自明的；反之，一个不能容忍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专制而自卑的政府，即便耗费天价的维稳费用，亦无法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都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里。很不幸，我便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不健康的社会当中：盘踞在我头上的政府，不是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而是以武力和谎言强迫大家忍受的政府。在中国，不是统治者被人民关进笼子里，而是统治者将人民关进笼子里。重庆一名怀疑自己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家长唐琳，只是在网上发表了几句泄愤的言论，五月被警方带走，七月初证实被“劳教”，罪名是“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所谓“公共安全”，其实是杀人者的安全。于是，杀人者获得高升，被害者继续受到戕害。那么，这种惨淡的现实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远远地羡慕美国公众和美国知识分子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的权利与自由呢？不，我不接受“某些东西可以言说，某些东西不可以言说”的“潜规则”，也不愿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是：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当年，性情羞怯的剧作家哈维尔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政治人物”，却因为“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的理想与实践，而受到捷克当局的骚扰、诽谤甚至逮捕。但他努力传达的信息绝对与政治无关。哈维尔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者争论，在一个靠着谎言执政的政权下，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他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捷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当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到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

由此，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选择了“萨米亚特”（samizdat）式的写作。这个词语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早在三百多年前，伟大的英国诗人弥尔顿便在《论出版自由》中表示：上帝赋予人类自由意志和选择善恶的能力，所以根据良心作自由讨论是最重要的自由。而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便写道：“那些思想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为了捍卫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坚守“萨米亚特”式的写作和传播方式：复印稿、打印稿、地下印刷品……这是一种“地下”状态的写作，写作者却保持着“地上”的阳光明媚的心态。在那个科技不发达、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时代里，他们的文字和思想的传递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比如，在罗马尼亚，公民不能自由地购买打印机，购买打印机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并由国家统一编号，以便当局调查打印稿是由哪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于是，作家们只能以手稿的形式，传播那些比较“敏感”的文章。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了互联网，但又出现了防火墙，我的文字都被他们用技术手段阻隔在墙外；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和台湾有出版自由，我写的书只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自己带回大陆的时候却遭到海关的查扣。所以，我的写作也是一种“萨米亚特”式的写作。这是一



种需要战胜恐惧的写作：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用最“刻薄”的语言“羞辱”政府和各级官员，而不必担忧秘密警察夜半敲门；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依照良心公开地敬拜自己的神，而不必担心受到政府的干涉与打压。这种“假装”不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这种“假装”有时需要付出沉重代价：比如，你的名字被列入宣传部的“黑名单”，你的电话和电邮遭到国保警察的窃听和偷窥，你来往的朋友会变得越来越少，你不能在大学的讲座和会议上登台发言……甚至还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仅仅因为追求“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高达十一年的重刑。刘晓波的判决书中被当作犯罪证据的那些文字，在我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段落。也就是说，刘晓波的罪名随时随刻都可能安在我的头上。

### 胡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不会在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作任何的退让和放弃。如果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活着，岂不成了行尸走肉？而言论自由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批评的自由，特别是批评统治者的自由。当我面对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既批评皇帝，也批判宰相。在帝制时代，暴君与奸相总是相辅相成的，暴君之暴与奸相之奸，乃是专制制度缺一不可的两个车轮。历史学者祝总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分析说，宰相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机器中，重要性仅次于君主的一个环节，一般说，它由君主精选，由统治经验丰富的大臣组成。“君主握有对一切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但一般不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宰相负责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然而原则上只能‘助理万机’，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没有君主，便无法统一封建统治阶级不同集团、派别的行动，便不能建立政权，形成国家；而没有宰相，一般说，统治机器便很难有效地运转。”换言之，既然宰相是君主亲自选择的，坏君主选择的必然是坏宰相，坏君主不可能选择好宰相；反之，坏宰相是坏皇帝实现其暴政的最佳助手，再勤奋的暴君也不可能一个人干完所有的坏事，那么坏宰相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君相关系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基本的架构。

用此角度透视中共的权力结构，即可发现：中共虽然言必称马列，其统治模式仍然沿袭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党魁即皇帝，党国即皇家，政治局即军机处，连他们办公的地方都是昔日皇帝居住的中南海。毛泽东拒绝梁思成的在老北京城的西郊设立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而是选择入驻皇帝的花园，不仅仅是为了舒适与安全，更是要取得当代帝王的象征性的身份。由此可见，中共这台统治机器的核心仍然是皇帝和丞相的“合二为一”。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可以合作至死，毛泽东清洗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权臣，却单单让周恩来成为“不倒翁”。当年，毛选择周作助手；今天，胡选择温作助手，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精挑细选”的结果。这是极权主义的必然逻辑：既生毛，必生周；同理，既生胡，必生温。毛与周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矛盾，胡与温之间的关系亦然。故意夸大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属于同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司令部”。毛与胡所干的每一件坏事，周与温都不能免除其帮凶的罪责。当代中国人之厄运，在于遭遇了翻天倒海、无恶不作的毛，但如果没有周之亦步亦趋、周密部署，毛之狂想则难以落实，故而周亦是罪不容赦的凶手。同理，在今天的中国，温家宝在整个政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温的配合与支持，胡的独角戏是唱不下去的。

对温家宝的分析与评论，可以放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宰相传统之中，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之。在这一传统之中，孔明和包拯是中国人心目中贤相的最高境界。中国的士大夫最喜欢的是诸葛亮，“一部西游全凭大圣翻跟斗，半场三国多赖孔明用计谋”，经由《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之渲染，蜀汉政权的丞相诸葛亮成了士大夫心目中智慧与道德的化身，成了历代争先恐后地“入君彀中”的“天下英雄”的最高人生目标。诸葛亮的“忠”，使他的声望甚

至盖过了主人，人们但知有“武侯祠”而不知有刘备墓。诸葛亮的“智”，则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厚黑学的先声。在人们一味的赞誉中，唯有鲁迅看出其“状多智而近妖”。而中国的老百姓最喜欢的则是包拯，他们喜欢的不是历史中真实的包拯，而是若干戏曲故事的主人公包青天。这个面黑如漆的包公执掌着一个具有惩恶扬善功能的龙头铡，这个龙头铡如同封神榜中神仙们的法宝，带给观众现实生活中最为匮乏的公义，也蕴含着生活在人治社会的人们对法治最热切的渴望。在戏剧舞台上，包青天甚至可以找来八贤王手中那只“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金铜，来一场“打龙袍如打昏君”的行为艺术。浓得化不开的孔明情结与包拯情结表明，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此重合在一起了。

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君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像德国人那样全身心地崇拜希特勒的时候并不多（毛时代是一个特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贤相充满美好之憧憬，即便君王再残暴，只要他旁边有一个孔明或包拯一样的贤相，这日子便可以忍受下去（所以，当毛的偶像崇拜破灭许久之后，许多普通人仍然对周不乏好感）。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君主是专制体制的大脑，那么丞相就是专制体制的心脏。丞相不仅使臂使指地指挥各级官僚，而且成为“屁民”与“暴君”之间的最佳“调和者”——没有丞相亲自出面抚慰，“屁民”哪能如此安于被宰割的悲惨命运呢？贤相情结继续在主宰着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古有孔明和包拯，今有周恩来和温家宝，似乎没有他们，中国人就不能生活得安安稳稳的。今天，温家宝的良好名声，除了归功于他个人出色的演技之外，也表明中国人的孔明情结和包拯情结的“现代转化”。

在此意义上，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的当代史又都是历史。就温家宝个人而言，他自觉或不自觉都以孔明和包拯为自我期许；就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戏剧和影视中的孔明和包拯的形象来对应现实中的温家宝。演员和观众都入戏了。“是耶，非耶，其信然耶；秦欤，汉欤，将近代欤”，温家宝下矿井吃饺子、到农村开拖拉机、在灾区搬砖头，都比央视精心制作的“下乡”的文艺节目“同一首歌”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但是，表演就是表演，表演是当不得真的。思想史家徐复观指出：“专制政治及抱专制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即是不过以儒术来作专制的装饰之用。”以此分析温家宝的内在人格与外在表现，画皮画骨、入木三分。温家宝执政以来所有的作为，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饰”。他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能力刹车或改道的驾驶员，更何况自己只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于是，他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坚持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胜利。至于下一场戏该怎么演，那就跟自己无关了。正是这样一种定位，使得胡温之间的搭配，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胡对温是绝对信任的。有的时候，胡甚至会允许温在媒体上抢了自己的风头，因为他知道温的出色表演对“九人团”是有利的，温不会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不知好歹地“自掘坟墓”。

鉴于胡温如同一枚硬币之两面，我对胡与温的批评，目的都是戳穿这种权力的“超稳定结构”。有朋友好心地劝告我说，不要点名批评胡温，这样做风险太大，你不妨只谈体制，以免触怒具体的批评对象。但在我看来，人与制度是一种互动关系，一套坏的制度，是靠一群坏的统治者来维持和推动的。忽略个人的责任，抽象地批判制度的罪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点名批评胡锦涛、温家宝和他们的前任、后任，以及他们的同僚、下属和打手，是我的生活和写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原则之下，我批评温家宝，乃至专门结集出版一本批评他的文集，并非我与他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他担任了总理这一职务——我的批评既是针对他个人的，更是针对他所担任的职务的。我希望的这一批评工作让越来越多的读者意识到，原来批评总理并非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本来就该是公民实践其言论自由的“家常便饭”。

### 我的“公民议政”不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每当我批评温家宝的时候，便会遇到一种“反批评”。在那些自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中，此观点亦相当普遍：温家宝毕竟在公共领域中表达了一些对民主的赞同和对民生的关切，即使他说的全都是一些无法实现的空话，也比那些连空话都不说的同僚好一些吧？温家宝这些支持民主、支持改革、关心弱势群体的表达，已经显示出他的政治立场与胡党魁以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职之是故，民间社会对温不妨多一些鼓励和嘉许，让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肯定，从而更有信心地去从事改革事业。或者，我们通过促使温家宝“向右转”的计谋，扩大统治阶层内部的差异，甚至让中共高层陷入内部分裂，出现“党内有派”的格局。这样，中国的变局才有可能早日到来。职之是故，他们指出，那些批评温家宝的声音，堵死了党内开明派腾挪的空间，甚至从反面加强了中共党内的团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批评温家宝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在我看来，此类观点是那些权谋术与厚黑学读得太多的人的癥症。首先，温与其他同僚之间的“分裂”，根本就是一部分“过于善良的中国人”在象牙塔中想像出来的海市蜃楼。温既不是毫无权力的摆设，也不是中南海里的异议者，否则他的“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言论，怎么会被当作全国高考作文的题目呢？否则他怎么可能在胡党魁都还没有独自出版著作的时刻，自己率先出版一本歌功颂德的访谈录呢？温家宝不是一个被架空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总理，而是一个精通权谋、明哲保身的总理。其次，中共统治者从来就不在乎“民意”如何，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六十年里，“民意”从来没有与权力阶层达成过“良性互动”。因此，用弱不禁风的“民意”去支持“潜在的改革派”，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加冕的“单相思”。而这类观点的更为致命之处在于：它将知识分子的写作与表达，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看作是权力运作中的一个棋子。即便是被打压的异议者，也汲汲于充当一名“地下帝王师”。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存在意义的贬低和蔑视。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扭曲自己的言论自由去迎合政治权谋的目的。这种观点的流行只能表明，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资治通鉴”式的中古时代。

与之相反，我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中主要表达如下之观点：第一，胡温是一体的，胡温与其他政治局同僚以及江系人马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分歧。党内各派系都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团结”乃是垄断权力的前提，“不团结”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的内斗通常会“点到为止”，而不会“见血封喉”。第二，胡温绝非改革派，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体制内部出现改革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坚持“不改革”的理念的人，才有机会成为“接班人”之候选人。因此，寄希望于中共领袖“自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与其憧憬明君或贤相的出现，不如从自己开始做起，一点一滴地对抗冷漠和恐惧的制度与文化。第三，我们要将批评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所有的统治者当作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由与权利，要让这种批评内化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探索与积累进行批评所需要的知识，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所说：“记住，无论冒多大的风险都要支持自由。……而自由，如果人们不了解它，它也很难被保存下来。人天生有权获得知识。伟大的造物主没有白费心血，他赋予他们理解力和求知欲。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权利，一种毋庸置疑、不可割让、不能废弃、神圣的、了解最令人敬畏和嫉妒的知识的权利，我所指的是有关他们统治者的性格和行为的知识。”我的观点当然可能有对有错，但我希望所有读者都参与到支持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业当中来。

我的公民“议政”从来不是黑幕后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我对中共内部政治派别的此消彼长以及探究这些大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我所追求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用我的笔，写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杨宪益先生说得好，“岂有书生能造反，倾城何必怨红颜”。但是，一个极为吊诡的事实仍然出现了：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我，居然成了

## 简介及序言

胡温当局派遣的国保们“贴身保护”的对象，居然被某些人定义为“搞政治的危险分子”，我这个小时候的“乖乖孩”突然变成了“不可接触”的“麻烦制造者”——出于真实的危险和想像中的危险，出于外在的恐惧和内心的恐惧，很多人不再敢跟我来往，国保们的孤立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了？不，跟林昭、顾准和遇罗克的遭遇相比，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如果放弃了上帝赋予的言论自由，我岂不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将是一个更加可怕的结果。所以，无论冒着多么大的风险，我仍然要这样生活、这样写作，不是说我有多么勇敢，而是说这就是我所热爱的、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

能够参与当代中国“萨米亚特”式的写作，是我的荣幸与异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刘晓波一起并肩前行。捷克“萨米亚特”写作的代表人物、作家伊凡·克里玛说过：“一个出于其内心的需要，敢于直面权力者，敢冒一切风险的人，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的人，权力来自何处，权力的起源是什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也许他会使他们变得多一些人性。然而，对那些当权的人来说，对那些屈服于权力的人来说，这样的目标好像是愚蠢透顶。可是，对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就隐藏在这些傻瓜的行为里面。”而“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亦指出：“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不为自己谋求政治权力，也不想成为道德权威委员会或社会‘良心’；他们不把自己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也不随意评判别人；他们的努力单单是为了净化并加强对一个更高权威存在的意识……今天，行为的动机可以不再那么单一，像以前一样，主要是出于恐惧或个人的利益，而是尊重人内在里最高的东西，他对义务和共同福祉的理解，对需要承担责任的理解，哪怕是承受某些不幸、误解与某种危险。”这正是我从事“公民议政”，致力于“萨米亚特”式的写作，以及批评作为总理的温家宝的原因。

我写作，我表达，故我自由，故我存在。是为序。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初稿



## 总目录

## 总目錄

鮑彤序：虛擬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推薦余杰作品《中國影帝溫家寶》

自序：戰勝恐懼的“薩米亞特”式寫作——兼論我為何批評溫家寶

### 第一卷 從來白骨易成精 化作千嬌百媚形

第一章：拒絕政治體制改革，信心與希望便是肥皂泡——評溫家寶訪談錄《信心與希望》

第二章：從蝸居中走出來的總理就能讓人民免於蝸居嗎？

第三章：屠童案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第四章：一切禍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如何破解溫家寶所說的宏觀調控的“兩難”局面？

第五章：謊言說了第二遍就能成為真理嗎？——冷看溫家寶與網民在線交流

第六章：溫家寶為何學不到胡耀邦的真精神？

第七章：溫家寶真的“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年輕農民工”嗎？

第八章：陶興瑤與阿米爾，誰更有尊嚴？

第九章：拂天變而不畏，恤大亂而不知——評溫家寶在西南旱災災區的言行

第十章：當總理，還是當地質專家？——評溫家寶在江西、湖南水災災區的言行

第十一章：欲練神功，揮刀自宮——溫家寶及歷屆中辦主任的榮辱升黜

### 第二卷 英雄巨像千尊少 皇帝新衣半件多

第一章：“活讀書”與“死讀書”——從趙紫陽與溫家寶讀書之差異說起

第二章：孩子們眼中的溫爺爺有多麼偉光正

第三章：溫家寶恢復了爺爺的私立學校，卻恢復不了民國教育的自由精神

第四章：溫家寶轉行當教師就能拯救中國教育的沉淪嗎？

第五章：溫家寶“三顧”北大應當見什麼人？

第六章：做官與做事——笑看溫家寶與浙江大學學生的對話

第七章：偽善是溫家寶與季羨林最大的共通之處

第八章：宦官已絕，文妖不絕

第九章：影帝的配角們 [（连载至此）](#)

第十章：溫家寶給香港學生題詞背後的愚民毒素

第十一章：劍橋大學無須向溫家寶道歉

### 第三卷 山外青山樓外樓 人生經得幾拳頭

第一章：取消國保是實現中國長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溫家寶總理的公開信

第二章：我來體驗溫家寶打造的“服務型政府”

第三章：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國保警察是如何陪我過“盛世”

## 总目录

的

第四章：那個殺人的日子與我有關 文字難傾國，書生不造反—我被第二次傳喚的經過  
中國警察的新死法：維穩死 神州處處皆酷刑 總理連城管都管不了嗎？

第五章：中國政府的尊嚴是靠羞辱妓女來維持的嗎？

第六章：“黃金時代的故事”繼續在中國上演

第七章：你們的結局會比昂納克更好嗎？——讀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牆》

### 第四卷 自由平等遮羞布 民主集中打劫棋

第一章：我們需要叔叔輩的總理，不需要爺爺輩的總理

第二章：從毛澤東的木乃伊到胡溫的御筆

第三章：溫家寶是遇羅克的同齡人

第四章：溫家寶與丹瑞大將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第五章：總理點石成金，小民脫胎換骨？

第六章：胡溫真的關心艾滋病人嗎？

第七章：看哪，這個用導彈對準弟弟的哥哥

第八章：戲法人人都會變，八仙過海比高強—從哥本哈根峰會、劉曉波案和谷歌事件看  
中美關係之變局

第九章：奧巴馬的姑姑與溫家寶的家人為何命運迥異？

第十章：難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資格改革嗎？——從葉利欽終結蘇聯看溫家寶的不作為

第十一章：莫道人人說影帝，西遊演罷是封神—溫家戲班中「跑龍套」演員的「絕妙好  
詞」

### 第五卷 何處不是人肉宴 古久帳簿幾篇章

第一章：這些狗貪食，不知飽足—強烈抗議劉曉波被中共當局判處十一年重刑

第二章：不是胡溫審判劉曉波，而是劉曉波審判胡溫

第三章：胡耀邦對待魏京生與溫家寶對待劉曉波之差別

第四章：既然緬懷杜重遠，便當釋放劉曉波—寄語葉公好龍的溫家寶

第五章：反黨與叛國—從陳獨秀案與劉曉波案看威權與極權制度之差異

第六章：朱厚澤一眼看穿“胡溫新政”和“中國模式”的真相

第七章：溫家寶不必聞“趙”色變

第八章：中國的國情根本不特殊

第九章：有時，我們要下到井底仰望繁星—從“麵包時代”的七七憲章到“蝸居時代”  
的零八憲章

第十章：從“六一”到“六四”，從“六四”到“六一”——“六四”屠殺二十一週年  
祭

## 第一卷 从来白骨易成精 化作千娇百媚形

### 第一章：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信心与希望便是肥皂泡

#### 评温家宝访谈录《信心与希望》

我谈论权利，是因为只要有了权利，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神灯表演。

卡兹米尔兹·布兰迪斯

中国是一个喜欢造神和喜欢编神话的国家。即便是无比平庸的胡锦涛时代，也要造出一个温家宝神话来抚慰失丧的人心。胡温刚刚上台的时候，人们对“胡温新政”的憧憬简直比直耸云霄的迪拜塔还要高。当胡温的两届任期已经过了大半，许多人才不得不承认“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冷酷与荒寒，中国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飞奔，胡锦涛亦名列世界六大独裁者的光荣榜，躲在胡锦涛背后的温家宝暂时“幸免于难”，但他其实是在幕后与胡总分享此一殊荣。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将对中共政权最后的善意寄托到温家宝的身上，认为温家宝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只是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不能大展宏图罢了，所谓“滚滚江山，只为大花脸争权，国老无能终散局”。于是，海外媒体频频制造各种关于温家宝的“假新闻”：比如，温家宝因纪念胡耀邦成为中南海中的“异见分子”，温家宝因倡导“普世价值”而受到保守派和军方的猛烈攻击等等。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学会避免在一个地方第二次、第三次地跌倒。几年之前，人们曾经对朱镕基报以多么大的期望，如今又将同样大的期望给予了温家宝，而神话只能一次接一次地破灭。

#### 温家宝出版新书《信心与希望》

中共的领导人都喜欢出书，这是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那里学来的传统。勃列日涅夫的虚荣心极强，他要证明自己在任何领域中都具备卓越的才华，包括文化领域。他组织了庞大的写作班子为其撰写理论文章、自传和长篇小说，并大量印刷精装本，将这些堂皇的巨著发布到每一个党小组之中。在中共王朝，从毛太祖到江世宗，也都喜欢显示自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面，温家宝虽然常常装扮出谨小慎微的姿态来，但这一次还是克制不了个人的虚荣心，下令结集出版《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一书，一夜之间摆满全国的大小书店。

这本书收入了温家宝两次与网友聊天和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内容，这是此前的领导人著述中罕有的材料。互联网在中共营造的铁幕上撕开一个大口子，中共投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日渐失效，中共当局意识到，除了消极防御之外，还要主动出击。于是，大大扩增网络警察的编制，并招募数百万兼职的“五毛党”引导网络舆论，甚至胡锦涛、温家宝亲自出马，上网与网民对话，放低姿态作亲民秀，以收买人心。胡锦涛性格沉稳阴冷，更喜欢在幕后发号施令，到台前演戏不是其所长。温家宝正好补充了胡锦涛的不足，他喜欢下矿井，探农舍，痛哭流涕；也喜欢引经据典，显示自己博览群书，上网回答一些经过严密筛选的问题，更是其展示与民众的鱼水情的好机会。

新华出版社的副社长要力石说，温家宝总理的网聊部分，不同于平日里的发布会，更有一种“促膝谈心”的感觉。他吹捧说：“除了纵贯国内外的大事，里面亦有总理个人生活经历和感想，这也体现出了温总理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亲民作风是做出

来的，而不是自然的流露。西方的政治家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的政治生命系于民众的选票，所以亲民是他们的本能；而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前任帮主指定或在密室中推举出来的，民众无权选举，所以亲民只是他们的表演。

“抬头望戏中，忠奸将相时时出；袖手观台上，真假包公去去来”，温家宝的表演颇受民间的欢迎，他就是要中共失去统治合法性和民意基础的时刻，给民众注射一剂春药，以点燃他们的“信心”与“希望”。而那些享受温家宝表演的民众，用学者余世存的话来说，就是一群“类人孩”。所谓“类人孩”，就是心智还没有成熟的、缺乏理性的人，如余世存所说，“是站在进化的立场上对某共同体中个体的生存状态的命名，可以说，前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都是类人孩。不过，类人孩更属于东方社会，更属于专制国家。”所有的“类人孩”都有浓得化不开的“恋母情结”，除了家庭中的母亲之外，温家宝便成了“党啊，亲爱的母亲”的最佳投射。

### “王霸结合”、“父母共治”的中共权力模式

温家宝在华人世界中颇有人望，汶川大地震之后他率先赶到灾区，感动得一名曾经以“耻辱者”自居的文人含着眼泪体贴地说，“他太累了”。还有很多到北京来上访的老百姓说，温总理是好人，只是地方官员太坏了，如果温总理知道了我的冤案，一定会让我沉冤得雪。那么，如何才能对温家宝实现“祛魅”呢？

中共的权力模式用八个字便可概括：“王霸结合”与“父母共治”。学者李劫在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帝王之术有霸道和王道之分，两者相辅相成；而中国家庭中的父母形象也正好是这两种角色的互补。由父亲施行暴政，由母亲主持仁政，前者雷厉风行，后者和风细雨。这种家庭结构与政治行为的对称性，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模式的构成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李劫对周恩来在毛泽东政权中的作用的分析尤其精彩：“周恩来自小养成一种阴柔气质，以至于在『五四』文明戏时代，他在舞台上扮演的竟是女角。事实上，周恩来一生所扮演的都是这个角色。每当那个父亲将那些不驯顺的子民责打一通之后，总由这位『母亲』出场作温存的抚慰。”

多年之后，毛泽东的狰狞面目全然暴露，毛泽东的伪神崇拜亦灰飞烟灭，而唯有周恩来的牌位依然在中共的“先贤祠”里屹立不倒，周恩来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还是“东方完人”的道德典范和人格顶点。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比干、萧何、诸葛亮、魏征、包拯、刘伯温、张居正等“贤相”序列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广大农民以及由耕而读的士大夫，对君王多半深怀敬畏之心，而对贤相则更多的是充满依偎之情。在这个意义上，周恩来是毛泽东时代的一颗“定海神针”，毛泽东差不多将昔日一起打江山的同僚全部清洗掉，偏偏让周得以善终，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周的这种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毛并不喜欢周，他听到周去世的消息之后，让张玉凤买来鞭炮在中南海中燃放，以泄心头之恨；但毛又离不开周，因为没有周的配合，他独木难撑，政令难出中南海。

今天的中共跟毛太祖的时代相比，根本性质和权力模式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党魁学毛，总理学周，并努力形成一种类似于“毛周配”的“超稳定结构”。江泽民时代的前半截，作为总理的李鹏对一夜之间获得高升的江并不服气，两人貌合神离；江泽民时代的后半截，作为总理的朱镕基则过于强势，与江泽民的配合仍不“和谐”，朱只能任一届，且当其财经干将纷纷落马之后，他本人就只能无所作为了。江时代的两个总理都没有达致对党魁“亦步亦趋”的程度。而到了胡锦涛时代，“胡温配”的契合程度，几乎直追当年的“毛周配”：如果说胡锦涛继承的是毛泽东的打狗棒，那么温家宝继承的便是周恩来的衣钵。

在一个死婴被当作垃圾的国家，何处觅尊严？

温家宝提倡的“尊严说”，让他赢得了不少心悦诚服的掌声。在《信心与希望》这本书中，温家宝在回答一名网友提问的时候，如此阐述他将怎样让老百姓活得更更有尊严：第一，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第二，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回答，温家宝可以得满分，这段话简直可以跟美国总统就职演讲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宣扬相媲美了。然而，正如一位当过右派的北大老教授所说，中共从来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八个字是不是可以用来反问温家宝呢？温家宝先生，你们的宪法和法律为什么不保障刘晓波和谭作人的自由和权利呢？他们是中国的好公民，不是国家的敌人。温家宝先生，你领导的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预算中，为什么大幅增加军费，而削减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的开支呢？温家宝先生，那些躲猫猫死、喝水死、自焚死的公民，跟你炫耀的 GDP 的高速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三个问题，让温家宝的三点回答显得那么虚伪和苍白。

就在温家宝的“尊严说”凯歌高奏之时，就在那些自以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搔首弄姿之时，从“和谐号”上传来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民众在山东济宁市郊发现二十一具婴儿的遗体。济宁卫生局方面称，这些死亡婴儿，“按法律规定，属于医疗垃圾”。是的，在这个可诅咒的国家里，这些孩子的尸体是“医疗垃圾”，是不配享有温家宝总理赏赐的“尊严”的。不仅是他们，那些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于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于毒疫苗的孩子，那些死于铅中毒的孩子，统统都被排除在“尊严”之外。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何来尊严之有？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为了捍卫死去的孩子的尊严，被温家宝的政府抓进监狱。赵连海的尊严与温家宝的尊严，怎么就相差这么大呢？

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信心与希望便是一串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虽然美丽，却一碰就破。温家宝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引用屈原《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明志。可惜的是，当年朱镕基已经发过了扛着棺材当总理的豪言壮语，温家宝再用诈死之计已经骗不了人了。这是一个继续“吃人”的国家，人肉的筵席一直在延伸着。哪一天温家宝的神话破灭了，哪一天这个人肉的筵席才能被掀翻，哪一天中国人才能真正活得有尊严。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日

## 第二章：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口吐真言，永远竖立

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圣经《箴言》十二章十九节

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时，有网友问，二零零九年房价涨得有些离谱，二零一零年高房价的问题会缓解吗？

温家宝表示，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我从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五口人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应当按现在的条件来改善群众的住房。其实，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乡居民的住房都有相当的改善，大概是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五倍，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三倍。”

马屁记者不小心泄漏天机



既然总理主动忆苦思甜了，下面的宣传机构立即行动起来。于是，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陈杰撰写的《温家宝，从一条小巷走出的大国总理》一文，考据出温家宝颇为清贫和艰辛的幼时生活，其中第一部分《小巷里的旧居》是这样写的：

温家宝，天津市人。温家世居今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后迁入城内。

“你找温家宝的家？”记者在天津市旧城南开区寻找温家宝中小学时代居住的房子。狭窄的达摩庵前胡同，拐角杂货铺的一位大婶指给记者，“那就是，他前几年回家时，我见过他”。亲切的口气像讲邻居家的大哥。

达摩庵，“文化大革命”前香火缭绕的尼姑庵。温家宝曾居住的是达摩庵前胡同九号院，推开年代较远的院门，面前是十分拥挤的小院，左侧翻修后房子就是温家宝过去的家。房屋的新主人刘志杰大爷、刘玉英大娘老两口，原住九号院对门，七八年前买下温家的老房。温家宝兄妹三人，他为长子，与父母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方米的两间平房，上大学前就在这里成长度过。邻居们说，温家宝的父母分别是中小学老师，带着三个孩子，家境很不宽裕，居室的“洋灰”地面坑坑洼洼，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非常简朴。老邻居敬重温家书香门第，至今称温家宝的父亲为“温先生”。在他们的印象中，温家宝很聪明，功课很好，做事稳稳当当。人们记得，他与小伙伴一起卸下院门当乒乓球台。母亲上班把房门钥匙留在邻居家，温家宝放学去取，“刘娘，我妈把钥匙放您这了？”言犹在耳。

温家宝到中央工作后曾几次回到这条胡同，看望父母，走访老邻长辈，亲亲热热拉家常，在众人眼中，他还是隔壁的孩子，没有一点官架子。有时，温家宝的母亲炸好面酱，托跑运输的邻居带到北京。

徘徊在这条有些破旧的胡同，站在温家老屋的原址，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就是从这里走出的，让人感到与历史贴得这么近，“平民情结”一定植根在他的胸中，他时刻惦念像儿时邻居一样中国千千万万普通的百姓，与他们共同创造幸福生活。

先不说这篇文章中的种种吹捧和谄媚之词如何让人肉麻和恶心，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在于不小心之间揭穿了温家宝的弥天大谎，就此而言，这名拍马屁的记者可谓功莫大焉：温家宝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全家五口人挤在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之中，但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篇文章却透露，温家宝一家拥有的是两间共二十一平方米的住房。九平方米与二十一平方米之间，足足相差了两倍多！即便是总理日理万机造成记忆有一定的误差，但也不至于相差到这样离谱的程度吧？更何况温家宝是学理工科出身的，讲究以“科学发展观”来治国。科学的原则在于尊重事实、在于一丝不苟，科学不是写诗，诗人可以将二十一平方米想象成九平方米，但一个科技工作者不能如此篡改数据，一名大国总理更不能如此瞒天过海。（待续）

### 从达摩庵到中海的路有多长？

这名妙笔生花的记者竭力营造温家宝此刻仍然“临在”达摩庵的幻想。但是，我想说的是，达摩庵的老百姓们，温家宝早已不是当年的“邻家少年”了。你们继续蜗居，他已登堂入室。温家宝的上位，靠的不是能力，而是演技，是说谎不脸红的演技。中国政府需要的不是一个大刀阔斧、根植痼疾的良医式的宰相，而是一个精通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技术的首席演员。于是，上行下效，既然一个堂堂的大国总理，连自己少年时代居住过的住房面积都要公开造假，他所领导的政府如何疯狂地造假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国家统计局才敢于拿出房价只涨了一个百分点的报告来；所以，山西省卫生厅才宣布不存在有毒疫苗的问题；所以，外交部发言人才敢于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只有罪犯而没有异议分子。温家宝政府，算不算是一个谎话大王领导一群贪官污吏的政府呢？

温家宝的话，常常说出了中国现实的反面。或者说，中国的现实很快就给他刚说出口的

话一记响亮的耳光。果然，温家宝刚刚表白说他对人民群众蜗居的处境“非常理解”，北京立即就出现了天价地王，房价再度飙升。以北京房价的均价两万而论，如果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生年收入为两万，一年的收入只能购买一平方米的住房。换言之，如果他购买六十平方米的住房，需要花掉工作六十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但一个人实际的工作时间大致为四十年，且还需要诸多日常开支、养家糊口，所以一套小小的住房足以压死一家人。面对此种处境，温家宝除了安慰性地说几句“理解”的话，简直束手无策。这样的人适合出演言情片，而不适合当大国总理。

当然，如果抱着“同情之心”去理解温总理，即便是他们一家当年居住的不是九平方米而是二十一平方米的住宅，也算是蜗居，也足以表明温家宝的平民出身。但是，无论是昔日的蜗居，还是今日的蜗居，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是怪中国的老百姓自己不争气、自己太懒惰吗？毛泽东时代全民贫困的局面，是因为党垄断一切资源，党控制全民的生活，党是刀俎，百姓是鱼肉，百姓只能任党宰割。在“大公无私”的毛泽东时代，所有的土地和房产都被收归国有，所有的住房都由政府分配。如同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很多时候，大饥荒的蔓延不是因为物资的匮乏，而是因为专制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同样的道理，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前三十年，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包括温家宝一家）住房条件的恶劣，也是由于毛泽东政权对民间社会的挤压、对民众劳动成果的剥夺造成的。毛泽东可以在全国各地拥有数十座超过昔日帝王的奢华的行宫别墅，老百姓却只能“四代同屋”，看看方方写的《风景》，就知道那样的生活有多么“幸福”了。

### 温家宝为何无法遏制房价的上涨？

而“毛后”所谓“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仅仅由于当局少作一点恶，少对民众少作一些束缚，蕴藏在民众之中的、自发的力量与激情，便如火山岩浆般迸发出来。是民众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水平（包括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而绝对不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们的造福与恩赐。然而，当权者看不得老百姓过上一天好日子。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当局再度以抬高地价的方式，第二次向民众征收隐形的重税，以此达成掠夺民众手中刚刚捂热的一点血汗钱的目标。所以，正是政府的“卖地”财政和“房地产”GDP，才让新一代的中国人深陷于蜗居的漩涡之中。人性都是卑微的，像《蜗居》中的女主人公海藻那样，不惜出卖爱情、青春和尊严，换取“告别蜗居”的生活，遂成为一种大部分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不知一惯都作道貌岸然状的温家宝总理，是否也会“理解”这样的生活选择呢？

温家宝大肆标榜当年的蜗居生活，是为了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吗？可惜，这个距离早已遥不可及：一入中南海，皇宫深如海，中南海里面的人，又怎么会跟蜗居里的人有共同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呢？但我还是想建议温家宝先生，既然你乐于回顾当年的蜗居生涯，就应当反思毛时代的人民的蜗居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就应当彻底批判毛泽东时代奴役人民、戕害人民的种种罪恶；既然你乐于回顾当年的蜗居生涯，应当对当下普通民众蜗居的现状对症下药，仅仅让部分央企撤出房地产行业只是杯水车薪，剩下的那批央企仍然占据着房地产行业九成的份额，各地政府仍然在乐此不疲地通过卖地拉动地方经济的繁荣，并加剧经济的泡沫化，你敢于触动这个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吗？你当然不敢“壮士断腕”了，因为你的弟弟温家宝便是一个大房地产商，你们的家族也是从猛涨的房价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吃到嘴巴里的糖你们愿意吐出来吗？

一个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的处境吗？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逆向的血统论。其实，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子弟，一旦进入中共一党垄断的权力体系之中，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存在差别的话，那就是：像温家宝这样平民出身的高官，有一种从底层奋斗出来的“于连式”的人格模式，知道苦日子是什么味道，为了彻底告别苦日子，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包括人格的完整和人性的尊严。正因为目前的饭碗来之不易，这类人比起从小养尊处优的太子党来，更是念兹在兹、战战兢兢。温家宝看到了赵紫阳的“前车之鉴”，遂奋不顾身地投入特权阶层，去瓜分属于自己的份额。所以，寄希望于温家宝出手遏制房价的上涨，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的老百姓只能继续蜗居下去，老百姓在蜗居中所付出的代价，正是温家宝和他的政权存在的前提。

### 第三章：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节目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凤凰卫视记者就近期校园被袭事件采访的内容。温家宝说：“政府也高度重视，对于几起凶杀案，造成的儿童的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对于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番话听上去似乎有几分诚意，毕竟他是唯一公开表示“心里难过”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然而，贵为一国总理，仅仅是对接二连三的惨案表示“重视”、仅仅是对诸多孩子的死难表示“难过”，是不够的。连御用文人余秋雨都知道“含泪劝说”，温家宝不能停留在跟余秋雨同样的水平上。否则的话，温家宝不妨辞去总理的职务，干脆去当一名“文化大师”算了。或者，如果担任总理只需要具备言辞绚烂、演技突出、随时流泪的本领，那么巧言令色、口蜜腹剑的余秋雨才是总理的最佳人选呢。

更为吊诡的是，贵为政治局第二号人物，温家宝却没有安排影响力比凤凰卫视大若干倍的央视前来采访，而是选择大部分国人都无法收看到的凤凰卫视来“表露心声”。国内各大媒体转载这一消息的时候，只是泛泛称之为“接受媒体采访”，故意隐去凤凰卫视之名字。究竟是温家宝无法控制央视、甚至不能通过央视来传递自己的观点，因此不得不将凤凰卫视作为一个临时的“透气孔”；还是温家宝严格遵循中共内部的宣传纪律，只有在面对那些国人基本上接触不到的媒体的时候，才敢说几句真话呢？

#### “飞地发展”必然导致暴力泛滥

在访谈中，温家宝承认，在若干血腥的屠童案件的背后，还有“深层原因”。然而，温家宝在这段讲话中并未明确指出“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抛出虚幻的承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来。连医生都知道，必须对症下药，温家宝连病根都没有找到，为什么就有药到病除的把握呢？这些案件充分表明，今天的中国社会远非“和谐社会”，也根本没有“以人为本”。胡温执政以来，当局腰包越来越鼓，财大气粗之后，以为“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殊不知，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模式”，不仅不能拯救世界，甚至也不能将中国带入繁荣自由的彼岸。中国当下的境况，不是欣欣向荣，而是病入膏肓。

近期中国的屠童案此起彼伏，其本质与美国时有发生校园枪击案完全不同：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多发生在大学和中学，凶手多为在学校就读的、青春期情绪波动的青少年，因此并不能推导出美国存在严峻的社会问题的结论；而中国的屠杀孩童的案件多发生在幼儿园与小学，凶手多为从外面闯入的成年人，他们大都未患有精神疾病，之所以精心选择最弱小的孩童下手，乃是对温家宝所宣扬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义”绝望之后的疯狂之举，这些残忍的杀戮已然显然出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夜，靠扩大警力维稳无异于抱薪救火，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治本。



近期虐童案件密集发生，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公义的模式。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剖析苏俄政权崩溃的杰作《帝国》一书中，用了一个概念来描述苏俄社会的特征，即“飞地发展”。他谦虚地说，这是“一个笨拙的术语”，其实这个术语非常形象且极为准确。卡普钦斯基如此描述说：“在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和瑞士，周遭的物质环境多少都以相似的水平发展：房子漆得工整，窗户上有嵌画玻璃，路上的柏油平滑，交通动线区分得很好，各处商店均有充足的存货，餐厅温暖干净，街灯明亮，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但在飞地发展的国家里，景象看起来就不同了。一间优雅的银行矗立在破烂的公寓建筑间；一间奢华的旅馆被贫民区包围；一个人从照明光亮的机场走进一个阴森、污秽城市的黑暗之中；在奥迪精品店光辉灿烂的展示橱窗旁，是当地肮脏、空荡、没有开灯的商店；在豪华的私人轿车旁是老旧、发臭、拥挤的城市公交车；首府建构了它芳香和发光的圣堂，发展出这些棒极了的飞地，却没有意愿，也不想要发展国家的其他部分了。”今天的中国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吗？从北京奥运场馆的中心区步行十分钟，从上海世博会核心区步行十分钟，在恢宏亮丽的现代建筑的阴影下，就可以发现连绵起伏、破旧不堪的贫民窟，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计其数的怨愤、绝望的人群——那些丧心病狂的凶手，也许就泯然于这些人群之中。这就是中国的“国际大都市”惨不忍睹的真相。

昔日的苏联因社会不公正而崩溃，今天比之更加不公正的中国如何吸取前车之鉴呢？即便温家宝权力有限，至少可以将财政收入向医疗和社保方面略微倾斜，至少可以约束自己的家人远离腐败、停止化公为私的“资本运作”。他有没有这样做呢？相信大家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 唯有自由才能消解暴力

温家宝的话音刚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次日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立即高调表示：“如果犯罪分子胆敢再采取这种手段，我们将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枪支的规定，坚决执法，毫不客气。”言下之意就是，在面对这类特殊情况的时候，警察开枪杀人的权力可以扩张，其口气中充满杀气腾腾的味道。而在相关报道中，橡胶警棍、瓦斯喷射罐、防卫钢叉等器械已经开始配备给校园保安人员。这种思路，仍然是以暴易暴的。然而，以暴力阻止暴力何时成功过呢？

武和平又说：“对有可能造成危险的人员，要通过群众的举报采取必要的救治和管理措施。”实际上，此前多起屠杀孩童惨案的凶手，并非精神疾病患者，而以武和平为代表的警方的观点，则将凶手统统视为精神疾病患者，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惨案都归结为偶发事件，以消除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也以此为借口，展开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性管理，甚至是强制救治和关押。这种只要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员，都可以对其实施“必要的救治”的思路，在目前人心惶惶的情形之下，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支持。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虐童案件反倒成了警方为所欲为的借口，又一批公民的基本人权将遭到粗暴的侵犯和践踏。

消除暴力的最佳方法，绝对不是让民众生活在更加不自由的境况之中。我想向温家宝和武和平推荐学者唐逸于二零零二年写作的一篇论文。这篇题为《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的文章，倘若早被在上掌权者读到并引以为镜鉴，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童无辜死难了。然而，“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唐逸的谆谆告诫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极权统治下的人性遭到严重扭曲，人的冷漠、猜忌、压抑、仇恨乃是变形暴力的温床。如果没有长期的压制和扭曲，怎么会突发文革的普遍暴力呢？”唐逸认为，总体上，人活得越自在，相互间的仇恨越少，则暴力越少。在此意义上，自由体制化解暴力的可能性较大。弘扬自由的精神，以此构成社会的基础价值和体制，乃是消解暴力和实现内在理性秩序的必由之路。

毫无疑问，只有当民众具备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时候，他们才会自觉地抵制犯罪的诱惑。可惜的是，温家宝和武和平们闻“自由”而色变。这些习惯上占有权力的人，很难理解自由精神，也很难承认和顺应历史的主流。他们总是以为人可以驯服于自己的意志或理念，可以压倒，可以臣服，可以由外来的强力（包括心理暴力如意识形态的复制）来改变。于是，中国的屠童案件愈演愈烈。

### 我们怎样才能活得有尊严？

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活得没有尊严，比起在他经济上处于劣势来，挫败感会更为强烈，而采取极端手段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軾所说的“不讲理”的社会，或者说“理”都被权利者所垄断的社会，必然造成许多人愤懑、焦虑乃至绝望，并将情绪发泄到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这就是校园血案“群发”的“深层原因”。温家宝此前提出“尊严”一词，确实抓住了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但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呢？除了立即和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别无他法。温家宝明明知道专制制度无法给予民众尊严，却紧紧抱着专制制度不放，这就是知行的脱节乃至对立。

普通民众有没有尊严感，这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的根本差异，也是英国为何相对平稳地实现了宪政改革，而法国者深陷于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的根本原因所在。十五世纪的英国大法官、亨利王子的老师福蒂斯丘在《英格兰政治法通博评传》一书中指出，法国属于绝对君主政体，国王是一切法律的滥觞，人民是国王的臣民；英格兰却属于有限君主政体，建立在人民自愿默许的基础上，国王本人和他的本国同胞一样，受制于同一批法律。英格兰是自由人的联盟，他们是自愿决定组成王国的，且最终的目的乃是“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然后得以生息并享受其财产，得免受各种祸患及损失，从而解除内心之忧惧”。所以，英国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的分野，却没有法国那么严重的阶级对立。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他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是前者，勿宁是后者。

今天的中国更像当年的法国而非英国。人民普遍活得没有尊严，不仅没有尊严，连中共长期标榜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那些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于有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于问题疫苗的孩子，那些被凶手残杀的孩子，他们的生存权在哪里呢？温家宝不能继续用无法落实的承诺来欺骗人民了，温家宝余下的任期已经屈指可数，如果他还不在于实现民众的人权和尊严上真正有所作为，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千古罪人。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五日

## 第四章：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

### ——如何破解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上午，温家宝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北（我发现那个创造了当代成语“鸿忠抢笔”的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亦赫然在座）、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说，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了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温家宝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中央的政策已经是顾此失彼：



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就不能大刀阔斧地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权力垄断造成的腐败、“低人权优势”下农民工国民待遇的缺失等）；而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加以处理，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如“天价维稳”、工潮汹涌等）也就无法彻底根治。此也不是，彼也不是，温家宝简直要抓狂了。

胡温上台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继续推行“强中央、弱地方”的政策。在经济上，继朱镕基以“两税制”改革，将“肥水”全都收归中央，造成中央财政的空前充裕之后，“国进民退”则成为胡温时代经济发展之大趋势。国有经济尤其是央企越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便越大。而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强，政治上便越发刚性僵化。有御用学者将一党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视之为有望取代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中央对地方的指挥棒，一手是GDP，一手是维稳。中央政府一边躲在幕后闷声数钱，一边以“维稳”对地方官员实行“一票否决”。这两个指挥棒比学生们顶礼膜拜的高考的指挥棒还灵。于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GDP数字，大兴土木，违背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肆兴建基础设施和楼堂馆所，掠夺性和毁灭性地开发各种资源，强行从市民和农民手中低价征收土地，造成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矛盾激化；而面对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地方政府从“截访”到“暴力维稳”，使得政府管制变得愈加暴虐与不义。

### 国进民退，灾祸不止

以山西的“省治”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山西民众的困苦、环境的恶化、生命的卑微、吏治的败坏，堪称整个中国的缩影，而这一切都是中央政府一手造成的。

二零一零年三月，作为国家和山西省“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的王家岭煤矿，突如其来发生透水事故，一百五十三名工人被困井下。后来，经过紧张的抢救，一半多被困工人获救，此一矿难的营救过程被官场大加宣扬，悲剧变成了喜剧。而死难矿工的名字，至今却仍有相当一部分未被公布。

此前，山西矿难频发，中央政府及当局制造的舆论均认为，这都是小煤窑惹的祸。因为私人业主急于赚钱，缺乏长远眼光和安全责任，视人命如草芥。所以，当局决定进行产权改革，将全省大部分私人拥有的小煤窑收归国有，经过“资源整合”之后，打造一批超级大煤矿。在此“化私为公”的过程当中，大量私人财产被以极低的价格强行并购。然而，大型国有煤矿真的就可以避免或降低矿难吗？

王家岭煤矿项目投资概算总额近五十二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二零一零年“奋斗目标”是产值六亿元，利润三千万。事后，安监总局的通报称，矿井存在“劳动组织管理混乱，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当班安排十四个掘进队同时作业，作业人员过度集中，且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不落实”等突出问题。事故发生前，井下工作面有多次有关渗水情况的报告，但是未引起重视。工作面出现透水征兆后，也没有按照规定及时撤人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最终造成重大透水事故发生。一名工人说，项目部整天催要进度，以前一个月他们最多能干两千米，现在提出干三千米。二十七队一名工人说：“我们每天开班前会的时候都是要进度，要速度，经理说要上六部钻，五个人上六部钻。”在此目标下，公司对于各个施工单位实行“进尺考核制”，掘进多了受奖，少了则会受罚。

由此可见，国进民退，灾祸不止。那么，地方政府为何不顾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疯狂地进行能源开发呢？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提拔标准，是“惟GDP是举”，也就是说，谁将GDP搞上去了，谁就可以获得升迁。地方官员为了打造政绩、发展经济、提升GDP，便挖煤矿、修电站、建高速、盖大楼，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圈走农民和市民的土地。地方政府的黑帮化愈演愈烈。所以，经济问题的核心，还是政治体制问题。

而地方官员的坏和黑，是中央政府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政府的败坏，的根源并不在地方政府自身，而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 GDP，是因为 GDP 的增长，是中共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最后的支柱。如果 GDP 出现大幅滑坡，中共的统治也就危在旦夕了。为了继续垄断权力，就必须保持 GDP 的持续增长，所谓“保八就是命根子”。而要“保八”，就得默许地方政府的为所欲为、残民以逞。于是，经济问题又回到了政治问题上。

其实，民国时代的山西，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曾经是一个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模范省。经过中共六十年的胡作非为，山西却不幸沦为中国最“黑”（不是煤之黑，乃是人心之黑）的省份之一。如果阎锡山复生，看到此种情形，不知该作何感想？近期，《南方人物周刊》作了一个《“山西王”阎锡山》的专题报道，还原了民国时期阎锡山治理山西的部分真相，有网友评论说：“老阎是山西人，他的祖宗都在山西，他会把环境污染了、把良田都变成工厂的厂房，让几十年后倒闭的工厂的地皮上无法种地？他会把煤矿都挖完让地下成为一个个大洞？他会以发展经济的名义把干净的水源变成排污口？他会让山西人赚一块钱、老外赚一千块钱？他是地方军阀，但是有些地方做得比现在的官员们都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啊！这地儿给弄糟了，换个地方做官去。”不知温家宝是否看到了这篇报道，是否愿意向阎锡山取经呢？

### 不能将地方政府当作替罪羊

同样是山西，还曾经曝光了黑窑的奴隶童工事件。这一事件同样折射出温家宝在宏观调控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两难”处境。当时，对于这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童奴事件，全球媒体聚焦，全国民众声讨。我特别注意到，大多数评论者愤怒谴责黑砖窑的老板和地方的基层官员，许多人对中央政府的干预和最高领导人的批示表态“坚决支持”。比如，《南方周末》的一位著名时事评论员认为，奴隶童工事件“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他甚至用“一场叛乱”来定义之。他写道：“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

类似的论点在网络上也层出不穷。有学者甚至认为此类丑闻的发生，是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为所欲为且欺骗中央。他们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坏的，中央只是暂时被蒙蔽了，一旦清醒过来，必然扭转乾坤，为老百姓报仇雪耻。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议加强中央的集权能力，中央越强大，政令便越畅通，正义便越彰显。

我不同意此种缘木求鱼的观点，也不同意此种察言观色的批评策略。我认为，黑砖窑事件并不是一场地方政府的叛乱，而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之下，中央与地方官僚联手对民众实施抢劫之后的分赃行为，在此事件中，中央并不是干净的。胡温难道真不知道地方上的种种乱相吗？我们不能低估中央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比如，以搜集信息的能力而论，一方面，中共的宣传系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制造谎言，使得老百姓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另一方面，中共的各个情治系统，包括新华社的“内参”体系，每天都在将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信息反馈到中枢。胡温对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不可能被地方官员蒙在鼓里，除非他们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胡温为什么很少主动去惩罚那些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吏呢？为什么往往是在民愤极大的压力之下，才不得不抛出几个替罪羊来？许多落马高官很快便复职了，比如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底高调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团派出身的李长江更是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了十一届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BBC 中文网记者乐

安在评论中讽刺说：“李长江担任质检总局局长期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扫黄打非』至少不直接关乎人命，中央高层的任命决定也算英明。”

无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监督和惩罚地方政府，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是对立的。中共的国家机器从来只会驱使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不会开去捣毁成千上万的黑砖窑及黑煤窑。那种希望国家机器以暴力来“镇压”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的呼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反倒显示出某些纸上谈兵的分子法治观念的薄弱与淡漠。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使用被“党文化”污染的“党语言”——再坏的坏人也不能不经法庭的审判而遭到“镇压”。那些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们，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理应得到公正的审判，而非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一旦国家暴力机器脱离法律的约束，今天可以“镇压”坏人，明天就有可能“镇压”好人。

所以，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必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感恩戴德。同样的道理，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中的灾民，西南诸省旱灾和南方各省水灾的灾民，也不必对前来体察民情的温家宝“感恩戴德”。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权力格局，才是中国各种人权灾难和环境灾难的根源所在。若要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遏制奴隶童工现象的蔓延，不能靠加强中央集权的政体、不能靠最高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更不能相信温家宝的眼泪。

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是政治问题，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问题的背后都是中央政府的问题。这就是温家宝所谓的宏观调控“两难”的处境。如何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此“两难”困局，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温家宝有没有勇气和魄力采纳之、实践之。答案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更加具体地说，可行的步骤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国退民进”，打破行业垄断，实现充分的自由竞争；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国民权利，加强地方自治和普及地方选举，弱化中央政府的遥控之权，让政府由“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温家宝和他的同僚们愿不愿意“自废武功”呢？

## 第五章：谎言说了第二遍就能成为真理吗？

### ——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我们既不像婴儿那样毫无遮掩，也不是随心所欲的百变神通；我们既能说谎，也能诚实；既会辨识谎言，也会懵然无知；既会被骗，也会探知真相。我们可以选择，这才是我们的本性。——保罗·埃克曼《说谎》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网页最后显示的提问近二十四万条，有评论说，“这完全成了一次全国性的网民集体上访”。但是，温家宝所回答的问题，都是经过工作人员整理并提交的，温家宝并不能看到全部的问题和真相。

“谁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温家宝早已习惯了这种“被蒙骗”的处境，他与欺骗他的下属之间达成了一种完美的默契。

#### 温家宝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温家宝回答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一位名叫“二三四”的网友提出来的：“温总理您好！一、什么时候给我们真正的民主权利？二、政府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三、政府什么时候才真正接受人民的监督？四、社会的种种不公平政府打算怎么解决？”



在推特中文圈上，温家宝的昵称是“影帝”。没有出色的演技，哪能实现从大内总管到太平宰相的飞跃？温家宝在“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但演戏的功夫还是一流的，退休之后，虽然不能像自以为懂经济的朱镕基那样去清华大学当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但到电影学院的表演系当个系主任倒还是绰绰有余的。温家宝胸有成竹地回答这个似乎很尖锐的问题，将这场民主秀推向了高潮：“我曾经引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来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有评论者赞扬说：“作为中国的总理，直接面对以网民的模糊身份出现的民众而不是在党内讲话，做出这样明确的关于民主政治表述，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注意。”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根本没有关注价值的廉价的民主秀。与其上网跟网民作象征性的交流，不如立即拆除中国的网络长城，让墙内的生活和墙外的生活融为一体。温家宝自上台以来，已经做过了无数次“中看不中用”的秀，从仰望星空到肯定普世价值，从哀叹民生疾苦到支持大学学术自由，但从来没有一句话落到实处。温家宝，人如其姓，性格如温吞水，正是现有体制下绝好的总理入选。

然而，谎言说了第二遍就能成为真理吗？喜欢旁征博引以显示有学问的温家宝，当然不会不知道，毛太祖当年说的这句话，根本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议会成员应邀访问延安，希望促成国共合作，避免内战爆发。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有了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场著名的对话。

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就在与黄炎培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民主只是暂时的遮羞布和斗争策略，一旦取得政权，中共实行的将是远远胜过国民党和历代帝王的“一党独裁”。当与黄炎培同为民主党派领袖的储安平发现“党天下”的真相的时候，为时已晚，只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悲惨结局。

### 黄炎培的卑躬屈膝与傅斯年的火眼金睛

在访问延安的这一行人中，唯一的清醒者是傅斯年。毛泽东陪同傅斯年参观延安，傅斯年看到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各地送来的锦旗，便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碍于情面没有出声。一天晚上，傅斯年与毛泽东两人上天下地地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认为毛泽东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心底认为毛不过宋江一流，便口无遮拦地挖苦毛道：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在赠傅斯年的间距中，遂题了首诗回敬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自比，言下之意就是，虽然我读书没有你多，在北大时候也被你们瞧不起，但现在我手上有枪杆子，天下便是我的了。毛泽东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他只迷信实力。

在那趟行程中，傅斯年不仅对毛不留情面，还痛斥同行的诸人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

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共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

黄炎培身为民主党派的首领，对民主之精义并不了解。一九四九年三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刚进北平西郊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炎培，两人畅谈时局直到深夜。这是其他人士没有得到的殊荣，使黄心潮澎湃。到第三天，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据说，在民主人士中，黄是首先喊出这个肉麻的口号的。一个真正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怎么会谄媚地去喊另一个必死的人万岁呢？

国民党时代以不当官自诩的黄炎培，不久即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四年又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原来，他不是不想当官，而是嫌国民党给他的官不够大。如果在共产党的治下当上更大的官，哪还管他民主不民主，哪还心思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中国文人之卑贱，由此可见一斑。

自此，黄炎培目睹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彭德怀庐山反党”、“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一九五七年，黄炎培的三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被打成“右派”。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其无耻程度堪比郭沫若。黄炎培去世于一九六五年，即“文革”前夕，这也许是他的幸运，死得其时；否则，在这场运动中，他这个“前朝余孽”命运难料。

### 谁是中国脸皮最厚的人？

纵观中共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后半生，堪称他们的那场著名对话的绝大讽刺。毛太祖成为让历代帝王甘拜下风的大独裁者，黄炎培不仅没有当上南书房行走，反倒连家庭的完整的都不能维持。这场对话本该被中共深深地掩埋起来，因为稍微有点羞耻感的人，都会认为这场对话对于中共而言，乃是“猴子的屁股”，最好不要去提及。然而，温家宝偏偏要去提及这场对话，并以之为自己施政的脚注。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是人若无耻，不可救药。如果评选“谁是中国脸皮最厚的人”，我想温影帝一定高票当选。

温家宝先生喜欢谈民主，谈正义，谈尊严。我想反问温家宝先生的是：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你为什么要将昔日的上司赵紫阳先生囚禁至死呢，他唯一的“不合作”就是不同意邓小平集团在“六四”时候开枪杀人，他何错之有呢；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你为什么将刘晓波和谭作人抓进监狱呢，他们比你更加热爱民主并践行民主，你应该将他们请到中南海来当你的老师才对；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剑桥的学生向你扔鞋子呢，你为什么干脆将那双扔上来的鞋子穿在脚上，显示你“有容乃大”胸襟呢；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你为什么要派遣国保以及国保雇佣的一群少年，来到我家楼下日夜监视呢，我对你们的“两会”等活动毫无兴趣，如果你们不来骚扰我，我甚至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

温家宝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可能是：民主，吾心向往之，但力不能及耳。但是，搬出毛太祖的名言还能继续骗人吗？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看来，温家宝比戈培尔还要自以为是，他认为，谎言只需要重复两遍就可以成为真理。当年，毛太祖说过一遍：今天，我温公再说一遍，就能像大魔咒一样，让全国百姓安安稳稳地充当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但是，温家宝忘记了美国总统林肯说过的另一段话：“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你决不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



温家宝的座右铭是：“天下事无非是戏，世间人何必认真？”但是，一场民主秀，真可以将衰世装扮成盛世吗？温家宝喜欢引经据典，不知是否读过晚清诗人、思想家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龚自珍是最早对辫子王朝发出盛世危言的先知，他说：“履霜之属，寒于坚冰；未雨之鸟，威于飘摇；痹癆之疾，殆于痼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我担心温家宝先生读不懂这段话，还是将其翻译成白话文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踩着秋霜的人比那正经受着严冬坚冰之寒的人更为恐惧，暴风雨来临前的鸟儿比正在风雨中飘摇的鸟儿心中更加悲戚，麻痹无知的肢体比身体上的痼疾更为可怕，将要凋零的花朵比已经枯槁的枝条更引人伤感。”温家宝先生有没有此种如履薄冰的感受呢？愿不愿意用实际行动来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呢？

### 第六章 温家宝为何学不到胡耀邦的真精神？

当年因胡耀邦逝世引发“六四”事件，导致胡耀邦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成为一个“敏感词”，虽然胡耀邦的敏感程度不及赵紫阳，但他还是基本上从公共空间和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尽管如此，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意愿相反，胡耀邦在民间的声望却越来越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之际，身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撰写题为《再回兴义忆耀邦》的纪念文章，全文三千多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的显着位置。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胡耀邦的忌日发表纪念文章，被外界解读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这篇四平八稳、空洞无物的文章，被某些海外学者“过度阐释”为胡温联手战胜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保守派、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信号。在我看来，此看法谬之千里。在今日的中共党内，究竟谁是保守派呢？我认为，保守派并不是已经衰落的江系，而是掌权的胡温。比如意识形态上的严密控制，比如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比起江泽民时代来都是巨大的倒退。此次温家宝撰文纪念胡耀邦，无非是想利用胡耀邦的威望挽回日渐衰微的个人形象罢了。温家宝幻想从胡耀邦身上捞取最后的一点政治资源和民意皈依，跟人们望眼欲穿的政治体制改革毫无关系。

胡耀邦晚年曾经对妻子说，他绝对不入八宝山，这句话表明他对中共体制完全绝望，这其中也包括对温家宝的绝望。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免职后，其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保卫待遇都要降低规格。香港《明报》后来报道说：“正是温家宝代表中共中央向胡耀邦一家宣布中共高层的有关决定。温家宝的表情相当冷漠，令胡家人十分反感。”胡耀邦在去世之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邓小平决定低调处理。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既是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七人小组成员，亦受命起草讣告。温家宝还到胡家宣布中央的有关决定，其表情也一如八七年时的冷漠，全无任何同情的表示，胡家人因此觉得他不近人情。由此可见，温家宝只是一个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政客。

#### 温家宝缺乏胡耀邦的求真之心

这些年来，关于胡耀邦的出版物中，比较有价值的有两本，一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所著之《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另一本是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胡绩伟、谢韬等中共改革派元老所著之《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前者描述了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胡耀邦，一改中国的宣传机构将领导人塑造得“高大全”的传统，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胡耀邦呈现在读者面前。温家宝离胡耀邦的真精神有多远呢？

身居高位的胡耀邦，最让人敬佩之处就是其求真之心。在如同鲁迅所说的中国源远流长的“瞒和骗”的传统之中，在中共“报喜不报忧”的情报反馈体制之下，“处宫禁之深”的高层领导人，一般无从了解“江湖之远”。领导者要想获得真实的、第一手的信息非常不容易，除非他肯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那些“老（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境地区）、贫（贫困地区）”的土地。

胡耀邦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下基层最多的人。而且，他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他对身边的人说：“像我们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到下边去，不要那些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做法，也不要组织什么群众迎送。”他外出视察总是尽量避免惊动地方官员，常常一两辆面包车，几个工作人员，就悄无声息地跑上了千里地。

满妹在书中写到一个“首长失踪”的小插曲：一九八五年秋天，胡耀邦在西北视察时，晚上住进一个兵站。大家休息后，秘书来到胡耀邦的房间，发现里面没人了。大家四处寻找，仍然不见踪影。于是，跑到门口问哨兵：“看见总书记出去没有？”哨兵摇摇头说：“没有。”大家继续再找，还是没有人，便又去问哨兵：“看见个小老头出去没有？”哨兵说：“看见了，一个人往那边去了。”大家沿着外边的小路追出去一里多地，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看见总书记正盘腿坐在一户人家的炕上，跟一群老汉们正聊得兴高采烈呢。

这样的小插曲是不会发生在温家宝身上的。温家宝也自诩为跑过两千个县，并多次引用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和白居易的“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来展示自己爱民如子。然而，温家宝到过的地方虽然有可能超过胡耀邦，但他看到的大都是类似于“横店影视基地”那样的布景。有网友透露说，温家宝二次去玉树时，某灾情严重的学校，其废墟本来已经清理，夷为平地，但为了让温站在废墟上讲话，有震灾效果，救援队又连夜将瓦砾石块等运回原址。次日，温家宝做艰难状爬上废墟发表讲话。由此可见，温家宝一边卖力地作这样的表演，一边撰文纪念似乎很真诚地胡耀邦，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

### 将自由还给人民，人民才能活得有尊严

在一批党内开明派老人眼中，张显扬认为将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本思想与党文化的分歧”，杜光则认为胡耀邦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可以支持上面的结论：八十年代初，“父亲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时，有人谈到多年来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当地，认为是『盲流』，主张『清走』。而父亲认为，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是其必然，政府要做出相应安排，而人为地堵是不对的，也是堵不住的；流动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那个时候，当局还在使用“盲流”这个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的词语来形容“流动人口”，这是毛泽东时代将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的统治思路的延续，即便在大饥荒的年代里，毛泽东亦不惜派出军队和民兵把守各地村庄，不允许农民外出逃荒，其统治手段之暴虐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遗风所及，即便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因为中国的宪法中缺乏对公民的迁移自由的保障，官员们仍然将那些背井离乡寻求活路的农民视为“不安定因素”。在此背景下，胡耀邦说的虽然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但这种“将自由还给人民”的想法却相当可贵。不是将自由赐予人民，而是将自由还给人民，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人民自己的。

与之相比，常常将“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名言挂在嘴边的温家宝，倡言“让人民活得尊严”的温家宝，却始终不明白自由与尊严的关系。为什么富士康公司连续出现“十三跳”，为什么这些背井离乡寻找更好的生活的农民工会“自愿”放弃生存权？这究竟是一家血汗工厂，还是一家设置在血汗国家的工厂？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平居然举重若轻地说：“这是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在转型期，太子党可以一夜暴富，农民工只能跳楼惨死？据李平说，多位中央领导对富士康事件作出了批示。那么，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究竟是什么内容呢？为什么不敢将这些批示公诸于众呢？这些批示又不关乎所谓的“国家安全”。环顾全球，富士康公司“集中营”式的管理模式以及保安所行使的警察权，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畅通无阻。因为视GDP为统治合法性来源的

温家宝，在本质上与郭台铭是一样的：郭台铭控制的不过是服务于富士康等各大工厂的近百万员工，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控制的则是十三亿中国人。中国人即便出得了富士康这个小监狱，却出不了中国这个大监狱。

中国人有争取生存权的权利和自由吗？高耀洁、万延海、胡佳三人，并非政治异议人士，只是艾滋病救助人士，却因为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的真相以及地方政府的玩忽职守，而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压与迫害。高耀洁和万延海先后被迫流亡海外，方能畅所欲言；胡佳被关押在狱中，身患重病而不得保外就医。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因揭露农村妇女被强迫堕胎的血淋淋的个案，亦被投进监狱并遭致虐待，其妻子和家人长期被监视、骚扰和限制自由。这些个案温家宝不可能不知道，在一次记者会上，有外国记者还向他问及胡佳一案，他虚伪而冷酷地回答说，“此案是依法处理的”。这不是一个愚人国的玩笑吗？中国人连争取生存权的权利和自由都被剥夺了，又如何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 改革之难是不改革的理由吗？

温家宝的雄文发表之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题为《改革路漫长，重温胡耀邦》的社论中说：“无论世人如何评判，胡耀邦早已走入历史。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人们至今对他尊崇有加，应该与当前改革在一些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停滞不前有一定的关系。人们希望通过胡耀邦唤起中国曾经具有的改革勇气，但在特殊利益集团无法撼动、改革缺乏共识、举步维艰的当下，重温胡耀邦或许能为改革造些声势，要翻起当年胡耀邦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那样的改革大浪，恐怕就是一个字：难！”这篇社论的着眼点在于一个“难”字上，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政治家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即便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要知难而上。因为越早改革，难度越小；越迟改革，难度越大。

胡耀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者。对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他立下了两大功劳：一是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二是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开始彻底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等政治运动。那时，毛的神话尚未破灭，挑战毛和“文革”需要极大的勇气。此后，胡耀邦在一线工作的六年间，大力倡导改革，虽然受到八大元老的干扰而最终功败垂成，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生气勃勃地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的人，比那些实际上躺着不动的人要高出一百倍。”更何况所谓的“错误”，乃是八大元老对他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毫无疑问，改革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但只有改革才能让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获得“双赢”的结果，而不改革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中国社会亦将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长，国际环境也堪称一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改革的条件优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百废待兴的那些年月。然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根本无意于重启八十年代夭折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无论是几年前胡锦涛允许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大会，还是如今温家宝发表追忆胡耀邦的文章，都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罢了。记者、作家高瑜在一篇纪念朱厚泽的文章中说：“胡温接班之后，胡耀邦几次被高层纪念、被回忆，胡耀邦简直成为了资源，多方抢夺，都要争当胡耀邦的传人。但是真李逵、假李逵一比武就分出真假来了。”一味作秀、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温家宝，不就是所谓的“假李逵”之一吗？

## 第七章 温家宝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吗？

据新华社电，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华民族传统佳节端午节来临之际，温家宝先后来到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西城区富国里小区、地铁六号线平安里站施工工地，看望孤残儿童和城市低保户，了解农贸市场蔬菜供应和价格情况，召开新一代农民工座谈会。在工地的会议室，温家宝与在北京建筑、制造、安保、餐饮服务等行业工作的五十多名年轻农民工代



表进行了“交流”。

### 农民工的“尊严”和“体面”

在这些有幸见到温大青天的农民工“代表”当中，定然不会有上海“钓鱼执法”的受害者、不得不断指明志的孙中界，也不会有河南的“硅肺病”患者、不得不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有碍观瞻”，不能入总理大人的法眼。

在座谈中，温家宝说，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我们的社会财富、高楼大厦都凝聚着你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你们的劳动是光荣的，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要关心农民工、爱护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温家宝还充满感情地说了一句：“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这是一出多么精彩的大戏啊，导演是温家宝，主演是温家宝，观众也是温家宝。

温家宝的这句话乍一听温暖人心，那些基本权利被剥夺和践踏的农民工们，大概又要山呼万岁了。但仔细一想，这句话却暴露出温家宝潜意识中的“父母官”心态。由于长期浸淫于中国的专制文化传统之中，温家宝并未意识到：政府只是一个公民选择和供养的、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包括作为“首席公务员”的国务院总理在内，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父母，政府和政府官员不能自作主张的充当人民的父母。将作为人民的一部分的“年轻农民工”当作“孩子”看待，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狂妄与傲慢。

就在同一天，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促进体面就业，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王副部长响应温总理之号召，在温总理的“尊严说”传遍大江南北之后，又东施效颦地提出“体面说”，并且将此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外国与会代表作了广泛介绍。他说，中国政府结合国情落实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就业契约》方面有诸多经验，比如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基本保障、关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推动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等。

既然总理都可以无耻，那么部长的无耻就算不得什么了。王部长侃侃而谈，好像中国是当今劳工权益保障最佳的国度，中国有资格向全世界介绍先进经验。我只是担心王部长的话说得太满，晚上睡觉的时候，富士康公司那些跳楼的农民工们的冤魂上门来找他论理，他还会如此理直气壮吗？这些农民工连命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体面”？“体面”是温总理和王部长们的特权。

### 查天赐与温云松：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

我又想给温家宝先生提建议了，可惜我提的建议都是温家宝先生不愿听的，所以我当不了南书房行走。我建议温家宝先生见一见那个名叫查天赐的农民工，查天赐比你的儿子温云松更加年轻，你若知道了他那惨绝人寰的遭遇，你会将他当作儿子一样来爱护吗？

查天赐是陕西的一名矿工，在一次煤矿爆炸事故中被炸伤双腿。开始两天，他被安置在矿工宿舍里。到了第三天凌晨，他被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到公路边扔掉。他一连好几天都在公路旁趴着，幸好有附近好心村民帮助，才不至于饿死。一月的渭南是最冷的时候，平均气温在零下三度左右，靠着一卷破棉被才没有被冻死。几天后，矿主派人来观看，发现他居然还活着，又让人将他弄到十公里外的蒲城县高阳镇的公路旁边。

当查天赐获救之后，记者来到蒲城县医院内三科病房，看到了他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由于几个月没有洗澡、刮胡子，加之伤口散发着恶臭，躺在病床上的查天赐已经失去了人形。他的双脚外面裹着两块破烂的塑料布，里面不断地向外溢出血水和脓水。据医生

介绍，病人被人送来时病情非常严重，体内严重脱水，两只脚也因为腐烂完全脱落，伤口大面积感染。目前，查天赐双脚从脚腕部向上十五公分的肢体均已坏死，需要作截肢手术。

如果温家宝与查天赐会面，他会想起《金融时报》上那篇题为《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的报道来吗？那篇报道指出，在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行业，“新天域资本”是最具影响力和最为成功的一家公司。该公司管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拥有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银以及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等诸多投资方。它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金宝大厦的办公室极为低调，在大堂甚至找不到公司的标识牌，只有到了十二层，才会看到门内有一块小小的牌子。这家公司并不需要奢华的办公室，因为它拥有中国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温云松。

《金融时报》指出，温云松和新天域是新一代更为强势的“太子党”的领军人物。这些太子党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私募股权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将削弱中国金融市场的专业化，“给公众更为恶化的中国高层裙带关系、权力无序的形象”。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表示：“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的最佳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行，但现在经济实力已发生了转变。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现在我说了算，手头什么单子都有一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分到大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翰指出：“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赚钱之道，人人都愿意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人人都心甘情愿这样做，以期博得高层领导人的好感。”

温家宝似乎有心对查天赐和温云松一视同仁。按照他的说法，无论是否有血缘关系，每一个农民工都是他的儿子。然而，为什么生活在同样一个新中国，查天赐如同在地狱之中，而温云松如同在天堂之中呢？查天赐是中国公民，温云松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的感受会有如天壤之别呢？原因很简单：温云松是丞相的儿子，查天赐是农民的儿子。

### 这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

日理万机的温家宝当然不会知晓查天赐九死一生的遭遇。查天赐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像奴隶一样的农民工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他毕竟从死亡在线挣扎回来，比他遭遇的一切更可怕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北京西单建筑工地上的几个农民工，就被搅拌机扫入混凝土之中。数天之后，当他们被发现时，尸体已经成为凝固的混凝土中的“木乃伊”了。温家宝手下的各级官僚没有一个因此“引咎辞职”。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远赴非洲为黑人服务的史怀哲博士说过：“我们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在中国，却始终未能建立起这种“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来。那个黑心矿主下令将被炸断双腿的查天赐像垃圾一样扔掉，他为何毫无怜悯之心地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仅仅谴责“这一个”黑心矿主是不够的，他只是“血煤”利益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黑心矿主的背后，还有更加黑心的政府。这个政府从来就不尊重人的生命，当然更不尊重人的自由、尊严和体面。除了官僚之外，谁能在“体面”地“活着”呢？中共在二十多年前在首都动用军队屠杀民众和学生，黑心矿主残害几个卑贱的农民工岂不是小巫见大巫？认命吧，查天赐们是不能抱怨一句的，若用名声卓著的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的话来说，原因只有一个——“谁让你生在中国呢？”

正如圣经所说：“隐瞒的事，没有不出来被人知道的。”很多人仍然对温家宝抱有一线之希望。其实，很容易找到一个验证温家宝是否诚实的方法：既然温家宝如此深情款款地对农民工们说，我和我的政府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你们，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农民工们也像温云松那样舒舒服服地“活着”？如果说温家宝在惩罚渎职的官员上无能为力，对打破从中央到地方牢牢纠缠的利益集团无从下手，但至少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父亲和家长吧？他管理国家力不从心，难道管不好一个家庭吗？既然他如此亲民、如此廉洁、如此真诚，是否可以给温云松下一道命令，让温云松将巧取豪夺的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拿出来，救济像查天



赐、孙中界、张海超这样的农民工？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温家宝就启动了他一个人开始的“自改革”，即便不能取得全面改革的成功，至少可以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温青天”。那么，温家宝有没有这样做呢？

温家宝没有这样做。他与其他掌权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这是一个谁的心肠最黑谁就能爬得最高的时代。当媒体上热衷于报道中国民众的幸福指数的时候，我不禁要问：这是温云松的幸福，还是查天赐的幸福？查天赐的苦难与温云松的幸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当温家宝和他的下属们不停地将“尊严”和“体面”这些美妙的词语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不禁要问：这是温云松的“尊严”和“体面”，还是查天赐的“尊严”和“体面”？查天赐的“没有尊严”和“不体面”，甚至失去了“生命权”，与温家宝、温云松们的“尊严”和“体面”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温家宝先生，你愿意回答我的疑问吗？

## 第八章：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洪水退去，我们探头

这苟活的墓园竟成为方舟

从碎裂的镜中，我重认自己的脸孔

\* 鸿鸿《加萨走廊》

阿米尔，一个在暗无天日的夹层中躲藏二十一年侥幸活下来的四十九岁的伊拉克人；陶兴尧，一个以自焚来抵抗强制拆迁而被烧至重伤的九十二岁的中国老人。这两个人，谁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 阿米尔长达二十一年的穴居生活

据英国媒体报道，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四十九岁的伊拉克男子贾瓦德·阿米尔终于从躲藏二十一年的一道狭窄黑暗的墙壁夹层中走出来。他的第一句话是：“萨达姆真的下台了吗？”萨达姆似乎永远不会下台一样。阿米尔是巴格达的一位居民，二十一年之前，有一次在言语中支持了一名得罪过萨达姆的什叶派牧师，此言行被秘密警察汇报上去后，阿米尔当即被萨达姆下达死刑令。得知风声的阿米尔迅速逃往父母居住的偏远的约巴村。

萨达姆要谁死，谁能活下来呢？一到父母家，阿米尔马上没日没夜地准备避难所，他在父母家两堵很窄的墙中间建造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夹层，仅在墙上留下小小的窥视孔，并在墙顶留仅能容一人出入的活板门。当这道活板门关闭之后，这个不到三四平方米的小空间就立即变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小窥视孔泄漏进一点微弱的光亮。阿米尔还在其中挖了一口小井，建了一条通往屋外的下水道，在这个小室中储藏足够吃上两个月的干粮。随后，他带上一只小收音机从墙顶的活板门爬进去，藏在这个狭小的墙壁夹层中。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藏就是二十一年。当美英联军攻下巴格达时，阿米尔通过收音机得知萨达姆垮台的消息，但他不敢立即出去。又过了几个星期，在确知已经安全之后，他决定告别黑暗岁月，回到阳光下。

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阿米尔告诉记者，在这个夹层中，他天天靠听收音机度日。渴了，就喝从井中吊上来的水；饿了，就啃父母为他准备的干粮。每隔一段时间，父母就从墙顶的活板门上给他吊下食品。据阿米尔回忆，刚开始躲进墙壁夹层中的那几个月，是他最提心吊胆的日子。三天两头有秘密警察光顾父母的家，藏在夹层中的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有一次，当他从窥视孔中往外看时，突然看到近在咫尺的墙外，一个陌生人的眼睛也正在瞪着他看。他还以为墙壁的秘密被人发现了，双腿一软，差点跌坐在地上。然而那名显然是秘密警察的

陌生访客，只是严厉地盘问了阿米尔的父母几个问题，随后就离开了。

阿米尔突然露面，让约巴村的邻居们大为惊讶。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阿米尔原来竟在父母家墙壁的夹层中度过二十一年，直到亲临现场看到那个窄小的黑暗洞天时，他们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一名邻居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阿拉伯神话！我们一直以为他失踪了，或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而且就一直住在我们附近！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阿米尔的母亲拉姆斯娅·哈迪已经年过七十，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十分健谈。她高兴地对记者说：“我的儿子重见天日，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喜事，因为这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又重新生了他一次似的。”他们一家感谢美英联军的正义行动，如果没有美英联军摧毁萨达姆政权，就没有阿米尔的重生。尽管大部分伊拉克人都很痛恨萨达姆，但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共和国卫队以及秘密警察，萨达姆永远都会以“全票”当选。

### 没有伊拉克战争，就没有阿米尔的新生

我真是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在黑暗的夹层中生活二十一年。在这个狭小的夹层里，除了一张小床、一个连着下水道的便桶、一个手电筒、一台老得掉牙的收音机外，就只剩几张阿米尔年轻时的自画像了。从这几张自画像中可以看出，他曾经是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而当他从墙壁夹层中走出来时，则是一副脸色苍白、胡子和头发花白的老头的模样。

阿米尔是不幸的，他在夹层中战战兢兢地虚度了二十一年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正常人理所当然享有的阳光和雨露。他比任何一名在监牢中的囚犯都要过得艰难。然而，阿米尔又是幸运的，他的很多同胞被萨达姆的长子乌代扔进狮子笼，或者被萨达姆的次子库塞拿枪对准后脑勺击毙。他毕竟历尽艰辛活了下来，看到了乌代和库赛被美军击毙的下场，也看到了萨达姆被押上绞刑架的那一幕。如今，一说起萨达姆来，阿米尔就恨得咬牙切齿：“这个独裁者毁了我的一生！”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阿米尔的笑脸。那笑脸灿烂如阳光。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生活在夹层之中、喜欢生活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喜欢每天晚上都等待秘密警察来敲门。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应当“宽容”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只能请持这样观点的人士亲自去体验。并不是阿米尔自愿的选择，而是一种邪恶的力量，逼迫他不得不生活在如同胶囊一样的夹层之中。所以，对这种邪恶力量的姑息，就是犯罪。一个阿米尔的受苦，就是所有人的受苦；而一个萨达姆式的暴君的灭亡，就是无数阿米尔式的民众的解放。

在伊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说：“有一种荒诞的说法：虽然我们爱自由，但别人不爱。认为我们对自由的依恋是我们文化的产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美国价值或西方价值；而阿富汗妇女满足于塔利班的鞭笞；萨达姆好歹为他的人民所爱戴；米洛舍维奇是塞尔维亚的救主。”布莱尔所嘲讽的那些看法，正是独裁者制造出来的精神麻醉剂，千百年来独裁者用它麻醉了亿万民众的心灵和肉体。独裁者们打着“捍卫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幌子，用民族主义对抗自由价值。然而，布莱尔掷地有声地驳斥说：“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西方价值，它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价值。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老百姓拥有机会选择，选择都是相同的：自由，而不是暴政；民主，而不是专政；法治，而不是秘密警察控制。”

### 谁逼一辈子拥护共产党的陶兴瑶老人自焚？

当我看到阿米尔饱经风霜的脸上又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的时候，在中国的报纸上突然看到另一张可怕的脸庞：这是一张如同被风化的泥塑一样的脸，这张脸上千沟万壑的皱纹比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更让人心痛。这张脸庞的主人，是九十二岁的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村民陶兴瑶。为抵制强拆，老人与儿子陶惠西共同自焚。拆迁人员见死不救，导致儿子死亡、

父亲重伤。这张老人昏迷中的照片是在雪白的病床上拍摄的，高龄加上重伤，老人醒过来的可能性不容乐观。无疑，中国的现实总是比任何艺术作品都要震撼人心，中国的现实总是比我们想象得到的丑恶还要丑恶百倍。

《新京报》记者崔木杨在题为《九十二岁老人自焚背后护子情》的报道中写道，自焚事件发生后，官方发布的消息里，陶氏父子都是脾气暴躁的人。邻居们却说，老人性情温和，是那种逢人就能聊上几句，每天都笑嘻嘻地过日子的人。陶兴瑶老人曾参加过淮海、渡江和金门战役等。老人的小腹上有一巴掌宽的伤疤，是金门战役时留下来。老人最常讲的故事，是肚子上的伤疤由来。他给家人讲，攻打金门的战斗中，他负伤，肠子被炮弹炸了出来，捂着肚子爬到红薯地，捡了一条命。后来他成了战俘，再后来他被交换了回来，可没过几年又被打成右派批斗。

这个细节让我不禁感叹历史的吊诡。陶兴瑶这位一辈子追随共产党的老兵，回顾自己被共产党欺骗、利用然后又抛弃的一生，不知当作何感想？共军攻打金门的战役失败了，如果那一场战役共军胜了又当如何呢？如果金门乃至台湾都被中共占领了，今天的台湾人，还能享有私有产权、选举权等基本人权吗？在中共比国民党还要暴的暴政之下，台湾会涌现出无数像陶兴瑶、唐福珍那样为捍卫私有住宅而不惜以死相拼的民众吗？而陶兴瑶老人当年如果不接受战俘交换而选择留在台湾，又会如何呢？也许二十多年都不能回到故乡，但至少不会在九十二岁高龄的时候再承受烈火焚身及痛失爱子的痛苦。而在今天的大陆，有谁能比陶兴瑶更加安全呢？就连陶兴瑶这样一个青年时代受中共的宣传蛊惑而为中共卖命的军人，到了九十二岁高龄的时候，都还要怒发冲冠、赤膊上阵，打这人生中最后的一场、也是最悲壮的一场战争，其他人又焉能幸免于难呢？

### 昨天是坦克，今天是铲车，何处是尊严？

温家宝的“尊严论”赢得了不少掌声，但在实际生活中，多少中国人连性命都不保，遑论尊严？在成都居民唐福珍自焚之后，温文尔雅的诗人苏小和出离地愤怒了，他以《看哪，大火烧毁女人，铲车碾碎了房子》为题写了一篇评论。他写道：“这一时刻，公民的合法财产变得毫无意义，铲车才是最高裁判，这些巨大的机器像一些怪兽，凶猛碾过我们的家园，像一辆辆野蛮的坦克，如同杀进战场一样，摧毁了我们幸福的客厅和厨房，以及墙上的玻璃、卫生间里洁白的抽水马桶。”是的，铲车和坦克是一路货色。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他们就将坦克开上街道，他们就用坦克碾压活人，今天动用铲车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作恶，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那些铲车，那些坦克，是奉谁的命令开出营地的？在前线开动铲车，跟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签字，后者的邪恶程度难道低于前者吗？苏小和说：“这个国家养了那么多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事实上他们只要主动纠错，是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为什么不去做，难道真的老了么，难道真的是担心自己官位稀薄，不得不明哲保身么。都已经是年近古稀的人了，难道做官比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伤害更重要么？不是说要仰望星空么？首先看看你的人民吧！一个仰望星空的人，也要记得低头怜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谁都知道，苏小和说的“那个人”是谁，那个逼得温顺如羔羊的公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自焚的人是谁。温家宝先生，请不要继续恬不知耻地使用“尊严”这个词，汉语已经被你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这是一个“王八”的天朝（推特上将天朝之“天”字改为“王八”两个字上下拼在一起）。天津宁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在做拆迁户的“工作”时扬言道：“在英国，你说不拆，任何人不敢拆你的。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这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是的，你们很牛逼，但你们的牛逼就是百姓的苦难。必须承认，今天中国人的

处境比当年萨达姆政权之下的伊拉克人还要糟糕，如果说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就是站起来去自焚的那一刻。倘若伊拉克到处都是像中国这样的野蛮拆迁的铲车，假如阿米尔父母的农舍被官府和开发商看中了，那么阿米尔再心灵手巧、再坚韧顽强，他还能继续躲藏在墙壁的夹层之中幸免于难吗？可见，阿米尔已经够不幸的了，但陶兴瑶比他还要不幸。这位年轻时候身经百战的老人，在病床上忍受着大面积烧伤的钻心的疼痛，而且还不知道二儿子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一具烧焦的尸体，这才是“情何以堪”！

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幸福，绝对不是温家宝先生赐予的。自由、权利、尊严和幸福，需要我们去争取和捍卫，从来不会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正如布莱尔所言：“我们是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战，为黑人或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左派或右派，乃至百万不同的人的自由权利而战。自由：在爱和希望中养育家庭的自由、生存并由自己努力获得酬劳的自由、不在恐惧中向任何人下跪的自由、做你自己——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情况下做你自己的自由。”一个漠视阿米尔和陶兴瑶的悲惨境遇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一个任由萨达姆戕害伊拉克人民、任由中共戕害中国人民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充满公义和慈爱的世界。

## 第九章：拂天变而不畏，恤大乱而不知

### 一看温家宝在西南旱灾灾区的言行

云南、贵州、重庆、四川、广西等西南省份大旱，四五千万民众无水可喝。就连云南这样水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就连四川这样名字中带有河（川）字的省份，都陷入了滴水贵如油的困境之中。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是当局片面追求 GDP 的增长而造成的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中国越来越像非洲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遇到水旱、地震等灾害，皇帝们会到天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祈求上帝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甚至下罪己诏自责。而中共领袖们的分工是井然有序的：作为党魁的毛泽东和胡锦涛，一般都躲在中南海里大笔批示；而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温家宝，则赶赴灾区视察，深入民间，了解民情。这并不能说明周恩来、温家宝比毛泽东、胡锦涛好心或亲民，而是各司其职：皇帝做皇帝的事情，首辅做首辅的事情。

#### 一个村庄的命运被改变了，整个灾区的命运呢？

此次西南地区旱灾，温家宝三赴灾区，灾区人民比盼望下雨还要盼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莅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婧从广西东兰发回了题为《广西：温总理治旱》的专稿。这篇报道特别描述了温家宝视察前后东兰县巴造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离温家宝来东兰还有十天的时候，当地官员便开始精心准备，所谓的“准备”，也就是营造旱情并不严重、官民一体斗志高之类的假象。三石镇副镇长黄遥说：“各级干部都特别紧张，几天几夜没合眼……你知道领导重视到什么程度吗？我们准备了一个向总理汇报用的东兰县全县抗旱示意图，需要摆放在巴造村村委会门口。在一天之内，就有不同级别的四个领导先后对摆放方式和位置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如此周密的布置，温家宝还能看到什么真相呢？他当然知道自己看到只是舞台布景，但他不会戳破这层窗户纸，他与基层官员之间早已达成了最大的默契。一旦说破，整个谎言帝国也就崩溃了。

温家宝走的是一条金子之路。温家宝离开之后，巴造村的村民们确实有福了：共三千多米崭新的输水管网架在了巴造村，将一里外的水引到每家每户。三石镇办公室主任陆锋说：



“现在各地都被要求上报项目。我们这个作为样板工程，应该是最快批下来的。”根据《东兰县抗旱减灾工作情况汇报》显示，总理带来的实惠还包括，上马水利项目四批一百五十六个，做到开工竣工率百分之一百、配套资金到位率百分之一百，组织实施总投资达两千多万元的库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让其他地方望眼欲穿的一系列好处，可以说是瞬间降临，难怪人们盼星星盼月亮地巴望总理大人亲临现场——当地村民黄妈秋感激涕零地说：“温总理是巴造村的贵人，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

看来，总理毕竟不是常人，即便天公仍不下雨，只要总理来了，一切都会改变的。看来，温家宝并非人们嘲讽的“温秀秀”，他还是可以做点实事的。当年，毛泽东谦虚地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我并没有改变世界，我所能改变的也就是北京的几条街道而已；今天，温家宝也可以谦虚地对全世界说，我虽然不能让中国人民全都站起来，但我至少可以让一个村子里的居民有水喝。总理屈尊来做村长的工作，这也是一种事必躬亲、无微不至的“爱心”，对于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青天大老爷，谁还能忍心批评呢？

然而，就连《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也忍不住在标题下面写了一句绵里藏针的评论：“在广西，一个被温总理改变了旱情的乡村颇为幸运。而它背后是整个自治区的旱情仍在不断持续、加重。”不仅是广西，整个西南五省的灾民已经接近一亿人，其中饮水困难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温家宝改变了一个巴造村的状况，如何改变整个西南五省的灾情呢？皱几下眉头，捡几块泥土，训几个官僚，少喝一杯茶，多说几句贴心话，就能拯救日益弥漫的旱情吗？

### 中国百姓的青天情结与奴隶人格

温家宝在东兰县旱区走访了一天之后，拟了一副对联：“山清水秀生态美，人杰地灵气象新”，横批是“日新月异”。下级官员们领悟，原来总理是让我们打造“环保县”啊，真是高瞻远瞩。在灾区百姓嗓子干燥如火的时刻，总理大人居然有心思吟诗作赋，可见其才高八斗。这副对联让我想起温家宝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小学课堂上亲笔写下的“多难兴邦”四个字。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百姓的灾难怎么就成了大人物们勃然兴起的代价？我还想起一个深情歌颂“中国站起来”的无耻文人说过，四十万在奴隶工厂中因工伤而残疾的农民工，将他们的身体“奉献”给了中国的崛起。人家又不是自愿，凭什么不由分说地“代表”人家“奉献”呢？这个自称“站在底层”的家伙，为什么不将自己的双腿和双脚统统奉献出来呢？温家宝的这副对联不知又要感动多少余秋雨式的帮闲了。但我要反问的是：既然此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总理大人何不将自己的家从中南海般到这里来呢？面对如此秀美之风景，必定能够日吟唐诗三百首。

温家宝的对联充其量也就是乡间秀才的水平，文从字顺而已。没有毛太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霸气，也没有周忠肃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纯真。在老百姓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总理，温家宝最需要做的，并不是写对联、留墨宝，而是思考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的大旱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又如何才能预防之。正是这些年来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为了提升 GDP，不顾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大肆修建电站和水库，才造成了集中中国水资源百分之七十的西南五省居然发生亘古未有之旱灾。连湄公河流域的几个下游国家也纷纷抗议中国以邻为壑的做法。所以，此时此刻，温家宝最需要做的，不是诗兴大发，不是滴几串眼泪（除非他的眼泪流成长江黄河，彻底解决西南五省的旱情），而是深刻检讨当局大建大坝政策的失误，向民众道歉，向自然低头。

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温家宝，哪里有向民众道歉的素质呢？任何一场灾难，都会成为他搔首弄姿、展示演技的好机会。《中国新闻周刊》记录了当地一名七十六岁的居民黄妈秋的一句感叹——“我有福气啊，这么大的年龄还能够见到总理。”黄妈秋一脸幸福，“总理来了以后，好多困难都解决了。”仿佛为了见到总理一面，不惜自己受灾一般，这就是

中国人的优良素质吗？难怪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要代那些死于地震的孩子立言说“纵做鬼，也幸福”了。

在我看来，黄氏的这句话是当下中国人精神状态最真实的写照。那些有可能当面质问和批评总理大人的危险人物，早被地方官员“和谐”掉了。当地的官员们在十天前就反复梳理和甄别，凡是忤逆不孝者都赶到戒严线之外去，剩下来的那些可能与总理打照面的居民，无不是真心爱戴总理的顺民。顺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乃是见到从北京来的大人物，就好像见到观音菩萨和财神爷一样。在此意义上，温家宝之所以成为温家宝，就是有这么痴迷于青天大老爷的民众；共产党之所以作威作福至今，就是有这么多“奴在心者”的国人安于被奴役的命运。

### 总理不喝茶，我们被喝茶

以表演艺术而论，在中共的历届总理中，直追周恩来的，大概就算温家宝了。自己也没有想到突然黄袍加身的江泽民，也很喜欢演戏，不过他像是话剧演员，举手投足都过于矫情，不如温家宝那种自然朴实的演出风格更受欢迎。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中说，温家宝来到重灾区云南省陆良县芳华镇狮子口村的时候，拔起一棵大麦，看到麦穗干瘪，顿时“眉头紧锁，神情凝重”。在干涸见地的水库，他“弯腰捡起一个蚌壳，沉默良久”。

更加“催人泪下”的一幕，发生在师宗县葵山镇大麦地村：七十四岁的村民王顺生在水窖打水，温家宝亲自拎起绳子打上一桶。温家宝比王顺生年轻好几岁，长期养尊处优，自然比披星戴月的老农民更可老当益壮。在院子里，王顺生的老伴起身给总理倒茶，温家宝微笑着婉拒：“我们不能喝你们的水，运来一点水不容易。”

连茶水都不喝一口，自律之严，宛如圣人。如此贴心的话儿，亿万“屁民”岂不泪如雨下、永生铭记？我想，这篇报道今后一定会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与周恩来的衬衣、朱德的扁担和毛泽东在大饥荒年代里不吃红烧肉的规定等故事相映生辉，且代代相传，甚至比钻石还要恒久远。但是，温家宝不喝茶，灾区的数千万民众难道就有茶喝了吗？正如毛泽东假惺惺地宣布不吃红烧肉，那些被他的暴政饿死的数千万民众就能起死回生吗？

温家宝另一番更有意思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面对旱灾，政府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群众的努力更重要。”换言之，当你们交税的时候，不能忘了对政府的义务；当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不要寄希望于政府，而要自力更生。那么，老百姓凭什么要缴税给一个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不愿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呢？那么，你这个自称日理万机的总理，除了演戏之外，还在做些什么呢？清末大厦将倾，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发出“拂天变而不畏，恤大乱而不知”的警告，这样的警告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温家宝。

温家宝在“不喝茶”这一中的演技，让奥斯卡奖和金马奖的影帝们都甘拜下风，他才是实至名归的世界第一影帝啊。关于喝茶，另一些中国人有迥然不同的体验：据独立作家冉云飞的不完全统计，“两会”期间“被喝茶”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超过两百人。美联社专门作了一篇关于中国的“被喝茶党”的报道，美国有反对奥巴马的社会主义政策、捍卫立国之初的基本价值的“茶党”，中国却有为了捍卫公民的基本人权而遭到国宝警察骚扰的“被喝茶党”。是的，温家宝可以拒绝老百姓献给他的那杯粗茶，民间维权人士却不能拒绝“中国的盖世太保”邀请共饮的那杯苦茶。

如果说影帝的尊严在于不喝百姓的茶，如同共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那么，中国的人权捍卫者的尊严在哪里呢？在于被迫喝国保警察的茶，如同圣经中所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 第十章：当总理，还是当地质专家？

### ——评温家宝在江西、湖南水灾灾区的言行

哪里有了灾情，哪里就会出现总理温家宝奔波的脚踪。比起李鹏和朱镕基两届前任来，温家宝跑基层最勤，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反应最迅速，看到底层民众的苦难时表现得最有情感。中国老百姓的性情是最驯良的，他们最能体谅政府的“难处”，官员们尤其是总理大人只要稍稍表现得有几许人性，吞没便不吝给予最高的赞美，视为青天转世、救星降临。于是，温家宝便成为自周恩来以后名望最高的总理，甚至有人将周温并列。二零一零年入夏以来，中国各地自然灾害频发，温家宝风雨兼程的身影又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记者们撰写的新闻特写一篇比一篇煽情，不仅凸显政府首脑亲自出现在抗灾第一线，而且反复渲染温家宝的“科学家”身份，似乎总理一到，便可雨过天晴、药到病除，灾民顿时获得新生、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在今天的中国，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都不单单是“自然”原因。中共建政以来的许多“天灾”，多半有“人祸”的因素。靠“工程师治国”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靠地质学家的“单向度”思维，最终是抱薪救火、弄巧成拙。此时此刻，温家宝需要做的，不是“变脸”当地质学家，而是以大国总理的胸襟与智慧，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之“窄门”，推进人权、民主与法治的进程。

#### 如今的“自然灾害”非地质学家所能解决

温家宝在湖南宁乡县峨山大坝考察防汛抗洪工作的途中，随机在一个村子旁边停下车来，巧遇了当地官员没有安排会见的一名村民。这个名叫陈凯旋的中年汉子对温家宝说，前几天天下大雨，他们福泉村附近塌陷出一个大坑。大家都提心吊胆。

温家宝说：“你反映的是一个大事情，涉及到群众的生命安全。”

其他受灾群众都围上来反映说：“我们那的学校都塌掉了。”

温家宝让陈凯旋带他去现场看看。当地官员试图劝说温家宝不要去现场，汇报说“已经制定了安置方案，群众也安全转移，请总理放心”。然而，当陈凯旋带温家宝来到一个直径近五十米、深三十多米的大陷坑面前的时候，现场却触目惊心：大坑边缘的民房由于塌陷只剩下一半，大坑周围只是草草地用竹竿围着。可见当地官员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漠然处之。温家宝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跨过竹竿走到坑边低头察看。脚下松软的土地随时都有再次塌陷的可能，大家都十分担心，但温家宝并不在意。

温家宝不畏危险、身临其境，本是首席公务员应尽之职责。但与玩忽职守、素餐尸位的下属官僚一比，“应该做的本分”却成了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崇高”。记者还写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就要离开时，突然一位妇女在不远处哭了起来。

温家宝：“别叫她哭，叫她找我来，没关系。”

她是一个塌陷重灾户，希望政府能重视理赔问题。她递给总理一张纸条。温总理认真地看了起来。

温家宝：“你这上写着了：‘我们每天日思夜想的，要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来看看，那该多好啊！’我不是来了吗？意思我懂了，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又给他们加上一项任务，我们

一定不让受灾的群众在经济上再遭受更大的损失。”

看来，温家宝在民众心目中就像是一个悬壶济世的活神仙，当人民对党和政府绝望的时候，却对温家宝抱有一线之希望。但是这种对人的希望，是典型的人治社会的特征。且不说温家宝是否真的当得起这番希望，即便他真有青天的质量与能力，法治社会和民主社会的远景就能由此呼之欲出吗？对此，就连《新京报》亦发表题为《不做总理“向导”的陈凯旋能否“凯旋”？》的文章，质疑说：“假如总理不是随机停车，陈凯旋能有幸面向总理反映情况吗？假如总理不是平易近人，陈凯旋能有幸当向导直达问题现场吗？”

而这个名叫陈凯旋的农民在给温家宝带路之后，深夜十二点镇上的干部前来敲门，将他的门都砸烂了，他一溜烟从后门跑掉了。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他“以前说话大嗓门，现在说话低三下四，还四下张望”。陈凯旋回忆说，就在他将温家宝带往大坑的路上，曾先后两次有人在背后拽他的衣服。在总理视察坍塌现场时，有一个穿衬衣的中年人低声对他说，你把总理带到这里，今后你没好日子过。还有一名穿警服的人也凑过来，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是什么人呢，居然当场威胁恐吓这个纯朴的农民？

那么，温家宝拿出了什么解决方案来呢？听了村民们的介绍后，他沉思片刻说：“因为我多少也是一个内行。几级领导都在这里，我们定下几件事，好吗？要组成专家组，圈定塌陷区范围。要迅速转移塌陷区内群众，决不能发生人员伤亡，要妥善安排群众生产生活。这几件事情必须马上做。”对于温家宝的决策，《新京报》上的这篇评论称赞说：“温总理的现场办公决策，既体现了对民众生命财产的关爱，又体现出科学专业的水平，理所当然赢得了村民的热烈欢迎。”

我却无论如何都看不出这几句话体现出何种“科学专业的水平”。当地地表坍塌的情况，连没有受过专业的地质教育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与当地官商勾结、疯狂采煤的行径有必然的关联。温家宝是学地质出身的，常常以“内行”自诩，却对村民反映的“附近煤矿采煤导致沉陷”的控诉不作响应，反倒是默认当地官员强调的“当地处于地质沉沦区”的解释，这是科学的态度吗？以高能耗维持经济增长，煤矿遂成为“血煤”；“血煤”吞噬人的生命，却又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如此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乃纠结成一个制度性的死结，若无大的政治智慧，根本无法解决之。

### 温家宝的“愿意被骗”与“不愿被骗”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江西。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江西第二大河抚河的唱凯大堤决口三百多米，咆哮的洪水奔腾而下，抚州市唱凯等四个乡镇顿成泽国，十多万人被水围困。三天之后，江西省当局宣称抚河成功实现堵溃，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唱凯堤决口十万人被困、无一人死亡。”此后，江西当局一直坚称“无人员伤亡”。就连前往视察的温家宝亦不禁赞扬地方政府的救灾工作“创造了奇迹”。其实，当地民众都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据《星洲日报》报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揭发江西官员集体撒谎，指决堤至少死了三人。刘建锋在博客中透露，唱凯镇低洲村村民涂俊峰等逃到一条高速公路，发现身后的低处还有三个人，涂等人奋力救出最近的一位妇女，但眼睁睁看着跑在后面的两人被冲走了。经查证，被冲走的老汉是低洲张村七十五岁的张根孙，另一妇女则不知其名。张根孙的儿子张新林也证实找到了三具尸体。

当刘建锋发表《目击者讲述决堤瞬间》一文、暗示有人被冲走后，抚州市官员将他接到当地一家宾馆，与宣传部长、财政局长等共进午餐。餐前，刘得到一个印有“抚州市财政局”、装有数千元现金的信封。刘当场以手机短讯向上司王克勤汇报，王指示他暂且收下，回报社



后上交报社纪委。后来，当刘建锋继续揭露真相的事后，王克勤对媒体透露，刘建锋接到了来自江西的恐吓电话，声称要动用黑社会干掉他。

《中国经济时报》是一份国务院下属的报纸，也是一份比较敢言的报纸。温家宝难道对该记者的发现一无所知吗？他明知是被骗，为何还对被骗的处境心安理得呢？他不是喜欢听真话吗，在访问北大的时候不还嘲讽校方的伪饰吗？可见，温家宝在某些时候不愿被骗，在某些时候却甘心被骗。他故意戳破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谎言，却默许甚至纵容大的谎言。戳穿一些小谎言，能够给温家宝带来良好的名声；而容忍大谎言，则表明温家宝也是体制中人，对于制度性的难题，只能“萧规曹随”罢了。

此次溃堤事件，当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纯属“客观原因”。抚州市副市长黄赛荣理直气壮地说：“目前还没有认定垮堤属于人为事故。”并大肆宣扬“没有一人死亡”的“伟大成就”，简直要将灾害当作庆典来办了。他们说，唱凯堤设计标准仅仅为抵御二十年一遇洪水，抚州财政有限，上级调拨的资金也不多，谁能为无米之炊？至于多处堤岸二十年标准也未达标，那是因为“资金短缺”嘛。洪水超历史纪录，谁能挡得住呢？堤身堤基土质差，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堤坝决口处为迎流顶冲位置，这又谁能改变呢？

这些很“专业”的解释，“素质太低”的老百姓无从反驳。在此天灾人祸频繁，天灾与人祸纠结的时刻，中国的地质专家、水利专家、环保专家、气候专家们却默不作声，集体缺席。那么，学地质出身的温家宝，是否可以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来呢？照理说，胡锦涛是学水利的，温家宝是学地质的，他们从事的这两个专业正是自然灾害的克星，在他们的治理之下，中国的自然灾害应当大幅减少才对；而事实上，这些年来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因为中国实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已经将中国的生态危害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此情形之下，既然温家宝时常标榜自己专家的身份，且又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式的爱国之心，如果改行当中国政府的“天灾人祸”发言人，他是否可以做到“实话实说”呢？

## 第十一章：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 温家宝及历届中办主任的荣辱升黜

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是直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央办公厅的职能范围，往往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情况而变化，主要负责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秘书、后勤等工作，理论上没有直接参与党和政府高层事务的职权。但由于办公厅历来直接负责包括领导人医疗、保安、通信、档案等日常事务的组织，其实际影响力往往远远超过其名义上的范围。

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称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名义上只掌管秘书后勤等非政治性工作，实际上政治人物在出任此要职之后，由于近距离接触最高领导人并掌握一系列政党国家机要，不但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而且往往之后被提升到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是，“伴君如伴虎”，这一职位堪称“高处不胜寒”，非有超凡的政治权谋及平衡能力，不足以应付此职位面临的种种挑战。一般而言，担任过此职务，锋芒会被磨平，人性会受戕害，此职位上很难诞生有魄力和远见的改革家。

表面上看，由中办主任升迁到最高职务——国家主席的，是杨尚昆。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是中共政坛的“常青树”，文革结束后复出，继续掌握实权。一九八八年，升任国家主席，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杨尚昆并非政治局常委，在元老中的影响力亦次于

邓小平、陈云。所以，真正由中办主任跃升最高职位的，是现任国务院总理、中国第二号人物温家宝。温家宝在一九八六年四月至一九九三年三月间任中办主任七年之久，虽然不是任期最长的（从中共建政之后算起，杨尚昆任此职长达十六年，汪东兴任此职长达十三年，王刚任此职长达八年，都比温家宝的任期长），但温家宝是唯一一位经历了三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办公厅主任。所以，要了解温家宝为何能够成为当代政坛上的“不倒翁”，进而判断温家宝是否真的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就必须追溯中办这一机构的渊源、性质以及历届中办主任的荣辱成败。

### 中办的历史与首任中办主任杨尚昆的起起落落

一九四一年前，中共党内没有办公厅这一机构建制。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二六年，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为王若飞。长征时，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才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中央秘书长张文彬的领导，王首道成为秘书处的第一任处长。

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杨尚昆为留苏派背景，此前从事共青团和工运方面的工作，此一背景本来难以进入毛共之核心层。但在长征时期，杨出任红三军团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力挺毛泽东执掌军政大权，从此便深受毛之信任。延安时期，杨尚昆除了担任中办主任之外，还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外事组副组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副秘书长等要职，辅助周恩来处理日常政务，俨然是毛泽东的一员心腹大将。

一九四九年之后，杨尚昆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显赫职位。虽然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因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其权力却较一般的政治局委员要大。文革前夕，杨尚昆因倾向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保守的官僚集团，逐渐失去了毛的信任。毛泽东行事诡秘，对讲话记录一向敏感。而作为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又不得不负责记录和传达毛的讲话，因此从五十年代初便开始在毛的住处和专列上安装录音设备。有一次，录音员跟毛的女友开玩笑，说从录音中听到了毛与女友的打情骂俏。毛的女友向毛汇报此事，毛勃然大怒，认为杨尚昆及其背后的刘邓一线官员对自己图谋不轨，遂决定将杨打倒。于是，杨尚昆不由自主地身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为文革前夕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之后被撤销一切职务，监禁十二年之久。

文革结束之后，杨尚昆获得平反，先是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然后重返中枢。八十年代，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一九八八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现在外交和礼仪的场合。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杨尚昆是元老帮与在一线工作的政治局之间的一道桥梁，虽然他不具有重大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却对各派系都有重大之影响力。杨尚昆精于权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下台，他都未被波及。相反，因为见风使舵地支持邓小平“六四”开枪和罢黜赵紫阳的决定，其权力在“六四”之后达致顶峰。杨尚昆利用担任军委秘书长的堂弟杨白冰控制军方，外界传为“杨家将”。杨氏兄弟根本不把新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放在眼里，擅自拟定军方高官的名单，与江的矛盾激化。结果，老谋深算的杨尚昆被江告了御状，邓小平亦忌惮杨家势力的膨胀，要确保中央“只有一个当家的”的权力结构，终于动手清洗“杨家将”在军界的势力。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被迫退休，失去了所有的权力。

揭露萨斯真相的军医蒋彦永平，在一封呼吁平反“六四”的信件中写道：“一九九八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

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一九九八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可见，失势的杨尚昆晚年对“六四”屠杀还是有一定的反思的，但他是否对自己的一生、以及中共整个制度的吃人本质有所反省和忏悔，则不得而知。杨尚昆与汪东兴一样，在各自担任中办主任期间，分别见证了毛时代前半期与后半期最隐秘的政治运作，杨尚昆是否留下文字记录，亦有待日后档案的解密。

关于蒋彦永信件中谈及的与杨尚昆的谈话，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公开予以否认，说“六四”期间蒋彦永医生并未为杨尚昆看病，杨尚昆也没有向蒋表达过对“六四”的看法。然而，杨绍明的这一否认根本是不成立的。蒋彦永说他与杨尚昆的会见是在一九九八年，并非“六四”期间，蒋彦永与杨尚昆的见面，相信未来可以找出更多的证人来。杨绍明拚命否认此事实，恰恰表明了高干子弟需要父辈荫蔽、屈从体制的可悲处境。杨尚昆一生不得自由，连他的儿子亦不得自由。可见，做过中办主任的人，“一日为奴，终身为奴”。

中办主任掌握中央决策流程，政治局常委及党内元老日常生活交往及工作动态，以至他们对内政外交重大政策的意见，所以这里既是信息汇总中心，也是信息传递中心，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届中办主任，在中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均能获得升迁，但是否仕途顺利、甚至入主中枢，则由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所决定。

一九六五年，杨尚昆在毛泽东那里失宠，被逐出中南海。不久，汪东兴继任中办主任一职。延安时期，汪东兴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工作，后来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等职，是毛泽东的贴身侍从。五十年代，汪东兴曾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并短暂外放为江西省副省长。一九六八年起，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等职，一时间权倾朝野。

汪东兴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宛如私人奴仆，而非高级公务员。即便如此，心思缜密的毛，仍然让汪琢磨不透。比如，林彪派系在庐山提出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并批判张春桥。汪以为这是毛的意思，一开始积极响应。后来发现毛的真实意图，汪这才如丧考妣，跪在毛的面前痛哭流涕，请求宽恕。文革后期，刘邓及林彪等多个派系均被毛打倒，汪东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一九七七年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俨然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汪东兴等文革受益者，将自己的命运与华国锋紧紧捆绑在一起，但其资历与资源却不足以与邓小平、陈云等复出的元老相抗衡。等到邓小平扳倒华国锋之后，汪东兴亦不能幸免，成为受到批判的“凡是派”，一九八零年被免除或提请免除所担负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央曾强迫汪东兴交出其私自保存的毛泽东的遗嘱，毛在遗嘱中明确规定由江青担任党主席。汪东兴掌握了毛时代后期的若干核心机密，但在其近期出版的回忆录中，基本上没有披露出什么有价值的史料。

文革结束后，出任中办主任的是姚依林，其任期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策划者之一，是中共在北方学运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之后，他长期在国务院的财贸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是中共少有的财经专家之一。在任中办主任期间，姚依林亦兼任新组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在经济政策方面享有较大的发言权。后来，他升任至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由于深受陈云的影响，姚依林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保守派，是反对胡、赵改革政策的干将。

姚依林之后的中办主任是胡启立。胡启立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团委书记、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文革期间，被下放“五七”



干校劳动。一九七二年，重新从基层干起，先后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委副书记、固原地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文革后，短暂回共青团系统工作之后，迅速升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刚满四十岁的胡启立即升任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

当时，胡启立是海内外舆论普遍看好的政治新星。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那一届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亦是赵紫阳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六四之后，他因同情学生、反对开枪镇压，而被免职，不过其境况好于赵紫阳。九十年代中期，胡启立屈辱地接受了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职位，而得以复出。后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及政协副主席，二零零三年退休。迄今为止，胡启立不曾对“六四”事件及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过任何看法。

胡启立之后，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间短暂担任中办主任的是乔石。乔石早年也是学生运动领袖，后来在上海和浙江的高校及宣传部门工作。六十年代起在外联部工作，一直升任部长。任中办主任后不久，即升任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然后继续高升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顺利经过了“六四”的“考验”，之后转任人大委员长，为仅次于江泽民、李鹏的第三号人物。

乔石之后任中办主任的是王兆国，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任此职。王兆国被认为是胡耀邦亲自挑选和培养的接班人，他的年龄与胡温接近，但在当时的地位远远高于胡温。胡耀邦下台之后，王兆国的仕途亦受到重大挫折，被外调为福建省省长。二零零二年，他进入政治局，但已经失去了掌握实权的可能，被安排担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和全国总工会主席等闲职，是政治局中的边缘人物。

王兆国之后、曾庆红之前的中办主任就是温家宝，温家宝的情形稍后再谈。接着说曾庆红，出身高干家庭的曾庆红，先后在部队和石油部门工作，一九八四年开始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并成为江泽民言听计从的左右手。“六四”之后，江泽民突然黄袍加身，曾庆红亦北上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九年升任中办主任。在此期间，曾庆红为江泽民巩固和拓展权力，完成“上海帮”在中央的布局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曾庆红迅速升任至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并于二零零七年退休。

曾庆红的继任者为名不见经传的王刚。王刚任中办主任的时间为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七年。王刚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是宣传干事出身，多年来在地方及部委担任秘书，基本上算是一个“职业秘书”。他是一名派系色彩不十分强烈的中办主任，得以在江、胡权力转移的几年间发挥某种过渡作用。待胡锦涛权力巩固，需要由亲信令计划担任此职的时候，王刚则被安慰性地给予政协第一副主席的职位。虽然这个职位也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却远离了权力核心。

现任中办主任为多年跟随胡锦涛的令计划。五十出头的令计划，为山西平陆人，普通干部家庭出身，年轻时曾经下乡种田，当过印刷工人，大学和硕士学历都靠在职进修。早年公职生涯几乎都在共青团度过，因办事勤快稳重而被提拔到北京。在一次人事异动中，成为当时共青团第一副书记胡锦涛的秘书。此后，除了胡锦涛在贵州、西藏时期，令计划都在其身边工作。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令计划更是跟随在鞍前马后。有海外媒体评论说：“令计划对时局有一定看法，能写一手文章，一些相处过的人，也称他待人和善。他的党内威望没有超过前辈，甚至没有传出和他有关的任何政治野心。令计划的影响力，和他的前几任比较，也更回归于制度。”确实，以令计划现在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很难如同其前任温家宝、曾庆红一样，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对政局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 温家宝只是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

中共的中办主任一职，类似于古代专门为皇帝服务的“尚书省”，因而也被称为是“大内总管”。中办主任的职权相当广泛，除了为最高领导人安排日程、保管档案等秘书工作，还负责全体政治局常委的安全、警卫、保健、保密，承担部份文件起草，为决策搜集重要信息，催办落实中央指示和领导人批示等。负责中共领导人安全警卫的 8341 部队，也由中央办公厅直接指挥。毛泽东去世之后，当时任中办主任的汪东兴，便利用这一职权，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支持下，亲自率领中央警备团的士兵逮捕江青等四人帮，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快刀斩乱麻地完成了权力转移，甚至扭转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中共独特的政治体制，很难在西方国家找到类似中办主任这样的职位。比如，在美国行政分支中，有白宫幕僚长一职，但其权力远远不如中办主任。而且，白宫幕僚长不是总统的私人奴仆，如果与总统政见发生严重分歧，一般都会选择辞职，获得自由身之后往往着书批评总统的政策，甚至揭露白宫之内幕。总统虽然权力巨大，却也对此无可奈何。此种情形在美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由此可见，白宫幕僚长拿的是纳税人给予的薪水，他宣誓忠诚于国家，却并非总统个人或总统所在政党的雇员。

武侠小说中常常有此细节：“欲练神功，挥刀自宫。”而要当上中办主任，差不多也要“挥刀自宫”。中办主任一职，最大的要求便是忠诚。作为最高统治者，一般都乐于安排自己的心腹出任此职，方能如臂使指，比如毛泽东与汪东兴、江泽民与曾庆红、胡锦涛与令计划之间关系，均是如此。汪东兴虽然一举逮捕四人帮集团，违背了毛生前的意愿，但若毛在世，他绝对不敢对毛有二心。其他一些中办主任，也大都有浓厚的派系色彩，如王兆国是胡耀邦提拔的人、胡启立是赵紫阳提拔的人，所以当胡赵下台之后，两人的仕途均受到沉重打击，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成为最高职务的接班人。

另外一些中办主任，如乔石、温家宝、王刚，则没有太强的派系色彩，属于谨小慎微的技术官僚。这类人物的权力根基较浅，尤其需要如履薄冰的心态和审时度势的智慧，在政局发生丕变的时候，才能保证不会站错队。比如，乔石在“六四”期间，一开始态度暧昧，待形势明朗之后，立即向邓小平集团效忠，并加入到谴责有长期共事关系的赵紫阳的行列，终于保全了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地位，并得以转任人大委员长。比如，王刚担任中办主任八年，前期是江泽民当权，王刚的上面是刚刚卸下此职、升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曾庆红虽然不再担任此职，却对许多事务具有最终之决定权，王刚必须看曾庆红的眼色行事；而后半期则是胡锦涛当权，胡锦涛最信任的是胡办主任、中办副主任令计划，令计划在职务上虽然是王刚的副手，但与胡锦涛的关系远比王刚亲密，所以王刚不得不对令计划“不耻下问”。在此种情形下，王刚能够完成长达八年的任期，殊为不易。

温家宝更是如此，他从一个平民子弟、地质部门的基层技术员，一路升到中办主任的显要位置上，绝非偶然。王刚面对的是江、胡交班的局势，此一过程虽然充满了讨价还价的内斗，但毕竟没有“破局”。而温家宝服务的两届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均非正常卸职，赵紫阳更是由总书记而成为被幽禁至死的“国家的敌人”。其间真是惊涛骇浪，稍有不慎，便被淘汰出局。温家宝对两名曾经朝夕相处的“东家”的遭遇，有何感喟？至今仍然“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过，温家宝能够做到既不受胡耀邦之牵连，又不受赵紫阳之拖累，且得到此前并无直接来往的江泽民之信任，如果不是具有超凡的官场生存术，根本不可能做到以“三朝元老”的身份“更进一步”。

对比王兆国和胡启立的遭遇，便越发可以看出温家宝深味“太极拳”的奥妙，是一个绵里藏针、大智若愚的权术高手。温家宝深知究竟是谁掌握着最高权力，比如八十年代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只是“儿皇帝”，所以他表面上是为胡、赵服务，实际上更是为幕后的邓

小平服务。当邓小平决定罢黜赵紫阳之后，赵紫阳命令温家宝通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温家宝却敢于拒绝赵紫阳的命令，说这个会议不必开了。这一举动，明显有违一个民主国家的高级公务员的职业伦理，却契合了中共权力至上的传统，从而使得温家宝深受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的信赖，“六四”之后官运亨通。

另一方面，温家宝长期担任中办主任，在此职位上比较称职，反过来却表明他缺乏独特的个性和政见，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勤恳不假，眼界却有限。他在进入中枢工作之前，一直在地质部门做一名技术官僚和政工干部，并无任何值得称道的政绩（比如，八十年代初赵紫阳和万里都是在地方上声誉鹊起才被选拔到中央任职的），也没有像胡锦涛那样外放为封疆大吏、独当一面的履历。所以，温家宝虽然表面上看是崛起于草根阶级，却对基层和中层的政治运作没有切身之体验和掌控。在履历的完整性上，温家宝甚至还比不上颇具争议性的曾庆红。故而，他无力梳理中央与地方之权力分割，更无法在行政改革乃至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本来，温家宝只是中办主任或国务院秘书长的较好人选，却阴差阳错地攀上了总理的位置，其才华及胸襟均不足以带动中国的新一轮的变革，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共的人才选拔制度的悲剧。

## 第二卷 英雄巨像千尊少 皇帝新衣半件多

### 第一章：“活读书”与“死读书”

#### ——从赵紫阳与温家宝读书之差异说起

温家宝经常在公开场合炫耀自己喜欢读书。二零零三年，温家宝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唐尼专访时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伴随我的整个生活。”他曾坦言每天至少抽一些时间读书，他与网民交流时说，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温家宝不是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谁是读书人的敌人呢？是万恶的中宣部，他们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既有不准公开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作家和学者的名字，也有诸多不得触及的“敏感”领域，诸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革”与“六四”等等。温家宝也不是不知道，是谁将读书人刘晓波关进了监狱，并剥夺了刘晓波在狱中读书的权利。

“读书人温家宝”与“总理温家宝”是不可割裂开来的。读书当然会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我们首先要看他读的是哪些书，他从这些书中汲取的是哪些内容，以及这些书籍与他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 赵紫阳晚年读什么书？

喜欢读书比不喜欢读书好，但更为重要的是读的是什么书。如果将赵紫阳与温家宝读的书和读书的方法及目标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便可以看出两人精神境界与思想水平之天壤之别。一言以蔽之，赵紫阳是“活读书”和“读活书”，而温家宝是“死读书”和“读死书”。

比温家宝年长一代的赵紫阳，出生于一九一九年，很早便投身共产革命，青少年时代在抗战的硝烟中度过，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赵紫阳一生都充满求知和求真之心，无论是在八十年代领导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惊涛骇浪中，还是在晚年幽禁的岁月里，他都手不释卷，尤其喜欢像金圣叹那样“雪天读禁书”。赵紫阳没有像温家宝那样接受过完整和系统的教育，这反倒让他拥有了自由之思想、开阔之视野和灵活的意识形态立场。所以，比较赵紫阳与胡温之差异，不能停留在简单地以学历论英雄的层面上。

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岁月》和宗凤鸣记叙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赵紫阳读过的许多书，温家宝从未读过，或者即便读过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表露和推荐。赵紫阳在精读完《顾准文集》文集之后，大加赞赏说：“顾准是个大思想家，在当今理论界还没有超过顾准的思想水平的。”他还称赞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说：“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真实。”在读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之后，他评论说：“这个作者写得比较成功，把周总理的内心动态、处世哲学写出来了，是从儒家思想臣对君不能不忠来叙述的。当年毛主席对周总理是不信任的，但有离不开他，又反不了他，即所谓『反周必乱』。”赵紫阳还一直最终吴国光、杨小凯、王力雄、周其仁等学者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对新左派和民族主义思潮持批评态度，对九十年代中期畅销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非常不以为然，他指出：“这完全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人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他也许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之后只有几年时间，“说不”类的书籍在胡温的鼓励和纵容之下再次大行其道。

赵紫阳还阅读大量的杂志和文献，其中既有国内公开出版的比较有锐气的刊物，也有港台和海外的“反动刊物”。比如，赵紫阳注意到康晓光在《战略与管理》（后来该杂志被中宣部关闭）上发表的鼓吹新权威主义的文章，由此他引申开去说，自己并非新权威主义者，邓小平才是新权威主义者。再比如，赵紫阳很欣赏李慎之的文章《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认为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真谛，即中国的文化传统乃是专制主义，而儒法互补又

是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就是所谓的道统”。他还注意到蒋彦永医生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焦国标的文章《讨伐中宣部》以及发表在香港《开放》等杂志上的刘晓波和我的文章等等。由此可见，他读书不是像温家宝那样是为了卖弄和作秀，而是希望从中看到中国的真相，找到解决中国当下的危机、带领中国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的方法。

### 温家宝是为作秀而读书

与赵紫阳的“活读书”和“读活书”相比，温家宝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死读书”和“读死书”。温家宝最喜欢在讲话中引经据典，香港中华书局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出版了《温家宝总理经典引句解说》一书，收集温家宝各种访谈、演讲、会议中引用的诗文、名句一百二十条。有一名教授经过专门的研究发现，温家宝引用的诗句百分之九十五教科书上没有。中国有那么多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课题没有人去研究，这个教授偏偏去研究温家宝引用的诗句和典故的出处，这种“文心雕龙”式的学问，实在是“中国特色”。作为纳税人，我们都不知道该教授通过这个课题，拿到了多少国家的科研经费。

温家宝尤其喜欢在文化教育界的活动中展示其读书之多，以激发他与文人们声气相通的情感。在二零零六年全国文联的代表大会上，温家宝引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史记》中的名句，以及屈原、苏东坡、郑板桥、林则徐、黄遵宪、艾青的诗句，还有左宗棠的对联、张载的座右铭、赵丹的遗言、康德的墓志铭和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温家宝深知台下的这批御用文人有多“酸”，在他们面前卖弄一下学识，是赢得掌声的最好方式。但是，文质彬彬有如何？学富五车又如何？作为诗人的隋炀帝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作为剧作家的唐明皇触发了安史之乱的发生。若不能“因真理得自由”，知识越多人越昏庸。

然而，我们稍稍梳理一下温家宝阅读的书籍，便可发现大都是中国古典的著作，与现实中国无甚关系。他似乎有意回避那些如同鲁迅所说的“带着血的蒸气”的著作。哪些著作对温家宝认识“活的中国”和“真的中国”有帮助呢？我可以推荐几本。温家宝曾经在甘肃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不妨读一读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记事》这两本着作，它们写的是大饥荒时代发生在甘肃的惨绝人寰的群体性死亡事件，这两本书能够帮助其“温故而知新”；温家宝多次探视艾滋病人，显示他对这一特殊人群的关爱，那么不妨读一读阎连科的《丁庄梦》，温家宝很喜欢展示“大国总理”的风度，但什么是“大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若有大国总理的胸襟，最应该读的是刘晓波所著的《大国沉沦》，那里面有他即便走遍中国的两千多个县也看不到的真相；温家宝日前在天津考察时坦言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困境，此时此刻他最应该读的是赵紫阳与朋友们经常讨论的那本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读这些书比读那些温家宝常常挂在嘴边的诗词歌赋强多了，在这些书中才蕴含着治国的智慧和赢得民心的秘诀。

### 温家宝从书中找到了成为伟大的政治家的秘诀吗？

在温家宝经常引用的西方书籍当中，颇有价值的有两本，一本是古罗马皇帝奥勒留所著之《沉思录》，另一本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所著之《道德情操论》。但是，温家宝真的读懂了这两本书吗？我看未必。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中旬，温家宝在新加坡参加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时曾说：“这本书（《沉思录》）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一百遍，天天都在读。”二零零八年九月，温家宝出席联合国会议，在回答关于中国政府如何应对三鹿问题奶粉的提问时，又引用《沉思录》里的一句话：“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于是，《沉思录》一下子冒出几十个不同的版本来，以“总理的案头书”而突然畅销起来。

在《沉思录》中，贵为帝王的奥勒留再三告诫说，要善待那些冒犯了自己的人，因为“每一灵魂都不愿意自己被剥夺真理”。温家宝接受了奥勒留的这一忠告吗？如果按照奥勒留劝诫



的那样去做，你的政府为什么将说真话的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判以重刑呢？更何况刘晓波的文章以及《零八宪章》，并非有意冒犯于你，而是深怀着对中国和平转型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的期望，这一期望不正与你再三宣扬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目标不谋而合吗？

奥勒留固然打造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尾声，但终其一生，都在各个行省之间奔波，作为帝国的救火队长疲于奔命——和北部及东部的蛮族战斗以保护意大利，忙于解决国内的瘟疫、饥荒和叛乱。温家宝的命运岂非与奥勒留一样？水灾、雪灾、地震、旱灾、经济危机……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延缓中共的崩溃，而不能将中国带向民主自由的未来。晚清重臣李鸿章晚年沉痛地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温家宝却连“裱糊匠”都不如。

温家宝重视的另一本书是《道德情操论》。在此书中，一向温和的亚当·斯密忍不住痛斥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职位的候选人们”，这些人的权位是“通过欺诈和撒谎、通过拙劣卑鄙的阴谋和结党营私的伎俩，通过穷凶极恶的罪行”而获得的。温家宝有没有毕恭毕敬地将这几句话作为自己及其政治局同僚们的“资治通鉴”呢？二十一年之前，难道你没有亲眼目睹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吗？如果说那时你职位卑微，不足以反抗邓小平等元老凶残的杀戮之心，但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你已身居党内第二号人物，你已任满一届又一大半届的总理任期，为什么不能响应蒋彦永医生的呼吁，切实推动为“六四”正名的工作呢？

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仅仅靠作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了改革“虽然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要像奥勒留所说的那样“为了真理和正义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要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用法律的力量去保护地位最低下的国民”。那么，还有两年结束其任期的温家宝，究竟还在等待什么呢？

## 第二章：孩子们眼中的温爷爷有多么伟光正

温家宝出身教育世家，所以在历届总理当中，他最关心教育问题。虽然说关心总是比不关心好，但究竟如何去关心，在我看来更加重要。每年一到教师节，温家宝的身影都会出现在上至北京大学、下至乡村小学的课堂上。我对温家宝与学生们一起上课并不感到惊讶，让我诧异的是，温家宝到北京市三十五中学听课调研之后，新华社发表的一组学生作文。

### 从学生作文看奴性人格的形成

新华社特别为这组作文加了编者按语：“这是一组来自三十五中初二·五班学生的作文，小作者们带着惊喜和幸福心情，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与温爷爷在一起上课时感人的细节。”待我仔细阅读这些文字，不禁瞠目结舌：这些年仅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居然已经如此娴熟地掌握了“党八股”的写法。他们如此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人格已经形成了，而这种奴隶人格的形成，老师、家长和社会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简单摘录一些精彩的段落：

——当广播里说亲爱的温总理要来时，我还半信半疑——以前常常在新闻联播和网上看到温总理亲切的笑容，在学校真的可以看到吗？究竟会是什么样呢？而当班主任说温总理就坐在我的后面时，说实在的，我都被吓傻了，能够跟国家领导人一起上课呀！我的心里是又紧张，又激动。

——我的内心却激动不已，无法平静。这节音乐课是新学期的起始课，老师先就此学期要学习的音乐课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要是搁在平时上课，我会大胆地举起手来，但是，今天……不知怎么了，手是怎么也举不起来，面对这样的僵局，温总理小声对我说：“你怎么不举手啊？”

一下课的时候温爷爷和我们讲了话，温爷爷说：“看到你们，仿佛回到了我的童年。”温爷爷说话语速很慢，但说的话很有道理，从温爷爷的眼神里看得出他很爱我们和老师。一位慈祥的老人，一位可爱的老人。最后温爷爷还与我们合了影，所有的媒体都在那里拿着专业相机卡卡地照，仿佛要把今天上午所有的美好都定格在那一刻。

一总理离我只有两个座位的距离，因此我能清楚地看见他那慈祥的脸庞。我对自己的动作非常拘束，生怕自己在温总理面前出错，那不是给三十五中丢脸吗？所以没有把握的问题我不敢举手发言，有时就连有把握的问题我也不敢举手，况且在那些摄影师面前我就更不敢发言了。

一我大着胆子回头看了一眼，震惊！就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脸上挂着无比温和的笑意，一件朴素的白衬衫，丝毫没有架子。这就是让我们敬仰的温总理啊！紧张啊，从小到大，这阵势还从没见过。

一前四节课我们和总理一起上课，一起聊天，犹如神仙一般，好似梦的感觉。

一第一节课是数学，老师站在讲台前，用激动的声音介绍道，温家宝爷爷来我们班听课，教室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温爷爷带着慈祥和蔼的微笑走进了教室，为了不影响我们上课，温爷爷坐在了我们教室的最后面一排。我兴奋得难以形容，多么幸运的事情，多么不同寻常的经历，我居然和总理温爷爷坐在一个教室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开始讲课了，平时喜欢的数学课，好像今天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这怎么行，我不停地在提醒自己，要好好地听，认真地听，万一回答问题时出了错，温爷爷会怎么看我。

一第五节音乐课后，温总理语重心长地为我们讲了一段话。总理声音轻柔、语速缓慢地讲道：“在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创办的学堂被战火摧毁了，那时的我们是不幸的，而现在的你们是多么的幸福。前些年我到甘肃靖远县，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拉着我的手哭个不停，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只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孩子上学。孩子们，你们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你们能够珍惜。我爱你们，也祝福你们！”温总理深情的讲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的一字一句，如春风化雨，洒进了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的心田。

### 美国的中学生是如何对待“大人物”的

我不想对这些学生作文——作点评。我只想举几个例子来作简单的对比。我去美国访问时，曾经跟一个朋友的正在念初中的儿子聊天。这个少年谈到不久前奥巴马总统到学校访问的经过，他说那天老师和同学仍然按部就班地上课，大家并没有感到多么兴奋乃至幸福。后来，他们就此事写了作文，一个女生说：“我想跟总统的女儿交朋友，我想知道她有没有觉得数学课很难。”另一个同学写道：“我发现，奥巴马总统一点也没有电视上的那么帅。”还有一个同学直言不讳地说：“我爸爸说，我们反对总统的医疗改革计划。我们全家都不喜欢他。”没有一个学生在作文说，总统来学校的这天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候，能够见到总统一面就是三生有幸等等。我接着问他：“老师没有教育你们要热爱总统吗？”他说：“为什么要热爱总统呢？总统是大家选举出来为我们服务的人，他做了好事情，大家会赞扬他；他犯了错误，大家就批评他。总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这就是普通的美国孩子对总统的看法，我们这里还需要向成年人普及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的观念，每一个美国孩子都不觉得深奥。我还想引述发生在加州惠尼中学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清楚地表明：美国的中学生是如何对待那些“大人物”的。惠尼中学是一所公认的“杰出学校”，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国其他地方的家长们，千里迢迢搬到附近的学区，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里入学。惠尼中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模范性和启发性，并在加州学科表现指数上独领风骚。

乔安妮老师教授公民高级选修课，这一堂课的主题是“政治权力”。她先让孩子们将兜里的美元掏出来，从美元上开国之父们的肖像讲起。她问学生们说：“权力是什么？”有学生回答说，权力是操纵信仰的能力；有学生回答说，权力就是金钱。老师接着问：“权力和权威有

什么区别，布什总统有其中一项，还是两者皆有？”一个学生回答说：“布什总统有权力，没有权威，因为二零零零年的选举他是偷来的。”一个更不喜欢布什的学生接着大声说：“他该有权威，也不该有权力！”而另外一个支持布什的学生说：“难道你宁可要戈尔当总统？”被反驳的学生则回答说：“不，我宁可要布拉德·皮特当总统。”乔安妮老师没有制止这场越来越热烈的讨论，她更不会害怕“隔墙有耳”，甚至担心班上有学生向校长告密，说她在课堂上散布反对总统、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乔安妮老师给孩子们布置的课后作业是，给当地议员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选举的经过并写成一篇报告。

另一个故事与小布什的弟弟尼尔·布什有关。尼尔·布什是软件公司的老板，计划向学校提供学习软件，校长邀请他到学校访问。按照惠尼中学的传统，贵宾参观校园的路线、介绍的导游等，既不由来宾决定，也不由校长办公室决定，而是由学生社团负责策划。尼尔·布什参观学校的一个项目，就是旁听戴夫老师的历史课。那天上课的学生准备了不寻常的欢迎方式。科莎和几个同学事先调查了尼尔·布什的履历，发现他所属的银都储贷银行管理混乱，导致纳税人损失十三亿美金，尼尔·布什本人被罚款五万美金并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这一堂课讨论的主题是前几个世纪的金融投机、银行倒闭和经济萧条。学生们决定将尼尔·布什的案例也纳入进来。结果，尼尔·布什飞快地逃离了教室，后来学生们说，他几乎是跑着出去的。戴夫老师是个保守派，投票给共和党，但他支持学生的做法。“那个主题和课堂讨论相关，”他说。“如果你接不了招，”他又说，“就别进来。”我们能够想象此种场景吗——北京三十五中会有某个学生当面质疑温家宝说：“你的家人是否在做大生意？”

### 一个丧失纯真的童心的社会何其可悲

被别人当作爷爷来尊重，对老人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这种幸福最好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享受，而不该拿到公共领域中炫耀。作为总理，出现在任何一个公共场合，包括中小学的课堂上的时候，都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不是孩子们的爷爷，而是为公众服务的“首席公务员”。可惜，温家宝再次将中国公私不分的恶劣传统发展到了极端状态。他以为，作爷爷状便是对老师和学生们最大的关爱，他错得实在太离谱了。

当温家宝阅读到这些孩子的作文的时候，他不会认为这些文字充显示了中国教育的失败，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显示了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成功。温家宝应当到袁滕飞的课堂上去，应当到卢雪松的课堂上去，应当到萧瀚的课堂上去，可惜，这些敢于说真话的老师都被“封咪”了。在今天的课堂上，老师一旦说真话，便如履薄冰，因为一种鼓励学生告密的文化正在蔓延和泛滥，这是一个没有青少年的社会，当年学者孙隆基对台湾社会的批评，用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恰如其分：“不少年轻人压根儿连青少年纯真的阶段都没有经过，就过渡到老年化的『老于世故』、『老谋深算』的那一套，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与社会大染缸混同，更有甚者甚至变成『老奸巨滑』，用传统文化阴谋术的那一套去暗算别人。”那些在作文中肉麻地吹捧温家宝的孩子，同时也很可能就是将老师的“反动”言论秘密汇报上去的孩子，他们知道这两种做法都能给自己带来相当的好处。

当我读到这些学生作文的时候，对这些孩子童真的消逝倍感哀伤。这些孩子才那么小，就已经坚信这样一种原则：应该向权力低头和献媚，而不是向权力质疑和抗争。这些孩子才那么小，就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影帝”合作演戏，“影帝”扮演爷爷，大家扮演孙子或孙女，好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啊！此时此刻，“爷爷”纯真如儿童，孩子老练如成人，正如孙隆基分析的那样：“一般说来，『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双管齐下，就是在一个人身上消灭了青春阶段，换言之，就是一方面长期地保持一个人『小辈』的形态，另一方面尽快地使他过渡到『长辈』的形态……这其实只是中国文化反对『个体』的整个罪行的一个环节。”这是一个人性扭曲和变态的社会，什么样的人才能游戏其间、且游刃有余呢？那些与影帝一起演习的孩子，才以他们的“早熟”而赢得了来之不易的“生存权”。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教育模式。靠那些根本不具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下



一代，就能够实现“中国之崛起”吗？在每一个教师节，我们更需要思索教师的职责是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在《知识分子与市场》一书中指出：“好教师不是以他的知识面宽、讲课条理清晰或者学生们的课堂反映好而著称……他的任务是激发学生们对知识的真诚的好奇心，逐渐灌输一个学生的良知——传授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的大量冒险行为和高尚品行。”中国有几个这样的老师呢？中国有诞生这样的老师的教育体制和社会土壤吗？这才是温家宝应当深思的问题。

### 第三章：温家宝恢复了爷爷的私立学校，

#### 却恢复不了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

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届总理当中，温家宝是唯一出身教育世家的一个。所以，他对教育有相当之关注，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比其他总理好。比如，他常常去小学、中学和大学视察，与学生和老师交谈，也常常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但是，温家宝的这点好心并不能拯救江河日下的教育状况。在专制政治与商品经济的压力之下，中国教育的水平不断下降，教育领域的腐败亦触目惊心。温家宝虽然撤换了不得人心的教育部部长周济，但是教育体制不变，换一个部长无济于事。而教育制度的变化，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换言之，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界的起死回生根本就是画饼充饥。

#### “苦难的旧社会”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温家宝只有七岁，但他却在诸多场合表示，他对“苦难的旧社会”有着深切而沉痛的记忆。同时，他在畅谈自己教育世家的出身的时候，却又透露出另外的信息来：在那个“苦难的旧社会”，有志于教育救国理想的公民，是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的，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温瀛士被荐担任天津民立第五小学校长。在办学中，为帮助更多的农家孩子特别是贫困女童就学，他努力减免学杂费，想方设法救助。一九二九年，他为了让学生受到良好教育，筹划将村中娘娘庙改为校舍，因遭反对愤而辞职。次年，温瀛士成立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名字是其亲自取的：“普”，即普适和普及；“育”，即教育和培育。一九三三年，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改称私立普育小学。温瀛士亲自题写校训“勤劳真实”，设计校旗、制作校徽、统一校服、教唱校歌。一九三六年，普育小学改名私立士范小学。士范学校，即培养才智之士的典范学校。当时，士范小学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学生为免交学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

温瀛士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至今受到宜兴埠父老乡亲的赞誉。乡亲们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温瀛士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金供养全家，生活极为俭朴。平时穿的是洗得发白的中式服装，吃的多是饽饽咸菜就白开水。他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各个学校通用的及网格线是六十分，但普育的及网格线却定为七十分，为的是激励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女生，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学得比别人更多的知识。一九五五年，温瀛士在自传中写道：“我对弟弟、子女的入学希望是为了使他们进入教育工作，不求做官发财，因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大计。以后他们开始服务，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今天还是那样。”

温瀛士的事业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既是因为他个人坚忍不拔、严于律己的性格，更是因为民国政府对社会的管制相对宽松，公民社会茁壮成长。以教育领域而言，这不是一个由政府全面垄断的行业，而向各种社会资源开放。当时的政府用法律确保了这种开放性，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可以说，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种职业培训、成人教育，都有公立、私立和教会三大类别，它们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学生有选择某一类教育机构的自由，以寻求最适合自己的成才的环境。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



虽然大都像温瀛士那样在经济上比较清贫，但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即便是那些粗鲁无文的军阀，也都谨守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

当时，温瀛士只是投身教育事业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比他获得更大成就的教育家还有很多，比如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后来，温家宝考入了南开中学，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开已经被中共当局掌控，失去了它的传统与精神。温家宝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党化教育。（待续）

### “幸福的新社会”却将教师当作敌人

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与世无争的教育世家的处境发生不变。迄今为止，温家宝对这段经历均避而不提。在那些介绍温瀛士生平的文章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温瀛士将学校交给了人民政府，并入宜兴埠第十八小学，改为公办。温瀛士先后任教天津市私立建华和慈铎中学，一九五二年八月后任教崇化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三十一中学，直至病逝。”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在经济领域强力推行“公私合营”，迅速将私人资本收归国有；在教育领域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和接管了原来的各级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前者是为了掌握国家之经济命脉，以实现其计划经济的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将教育当作宣扬和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自然不允许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继续存在。于是，温氏家族创办的私立学校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便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权威人物都不得不接受“再教育”，而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温瀛士，面对新政权的巧取豪夺、压制逼迫，除了屈从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贯穿整个五十年代的，是一次比一次程度激烈和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在文化教育界是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等等。毛泽东一意推动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对文化的尊重，也打断了民国以来中国人追求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现代化的进程，让中国跌入了蒙昧、野蛮和残忍的原始社会的深渊。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教师群体一步步地沦为备受歧视的“臭老九”和“牛鬼蛇神”。温瀛士是一九六零年去世的，这十年间他的日子可能好过吗？这个曾经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基层教育官员的人，有可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吗？那么，他有没有留下记载其心态的文字呢？而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温家宝有没有还原自己的爷爷一生起落的真相的勇气呢？

温家宝的父母都曾经在爷爷创办的私立学校中任教，后来也不得不在公立学校中继续其教师生涯。温家宝的父亲温刚，四十年代初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宜兴埠公立第二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市立二中、私立育青中学、私立普育女中、含光女中任教。一九五二年二月后在天津市女四中、三十二中、九十六中任教。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安生，先后在宜兴埠私立第五小学、私立普育女子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天津市城厢区补习学校、广播自学校、南开区东门里小学等处任教。按照温家宝的说法，他们一家老小很长时间都只能“蜗居”，可见在中共的统治下，教育工作者不仅失去了自由办学的条件，在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窘迫之极。而温家宝“文革”期间在地质队工作的时候，还一度被说成是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上受到冷落。由此可见，作为教育世家的温家命运的逆转，亦是中共迫害教师、戕害教育、消灭公民社会的暴政的缩影。

### 与其恢复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无疑，温士瀛是幸运的，他有温家宝这样一个终于“官拜丞相”的孙子。所以，温士瀛创办的私立学校在消失半个多世纪以后，终于在名义上获得了恢复：媒体报道说，天津历史名校一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普育学校恢复建成，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该校创办人温瀛士的次子温强（也就是温家宝的叔叔）为新校剪彩。而其他千千万万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却连这种名义上的恢复亦可望而不可及；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教育家们，去世后多年亦难有温士瀛这样的“出土”之日。

据报道，新普育学校重建于宜兴埠第二小学原址，总建筑面积三点九万平方米，为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为六十个班，其中小学部三十六个班，初中部二十四四个班，在校生人数可达两万八千二百人。从规模上看，这所新学校堪称“巨无霸”，当年以一己之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艰难办学的温士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普育学校有朝一日居然得以扩展百倍。

然而，大则大亦，普育的精神和传统依然无法恢复。当年，作为一所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私立学校，普育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此种自由精神是在民国社会整体上宽松和多元的大环境下孕育生长出来的，正如研究民国教育的学者谢泳所指出的那样：“从废科举到辛亥革命、经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有许多政治变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变的。这一时期，处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终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对办教育来说，关键要看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什么人。”从张伯苓、陶行知、叶圣陶到温士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渊博的学识、有高远的理想、有高尚的人格。放眼今天，教育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即便有温家宝以总理的权力恢复其校舍，却也无法在一个专制社会的大背景下营造一个拥有自由精神的“教育飞地”。我相信，温家宝对教育界的关心不是装出来的，他的诸多讲话确实也有出自肺腑之言，比如他强调说：“教育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但是，如果不打破党化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格局，不触动教育领域这个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温家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不久前，教育部宣布，将派遣数千名中小学校长赴英美国家学习考察，以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与其耗费巨资远赴重洋，不如返求诸己，找回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学者薛林荣在《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一文中写道：“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在此意义上，温家宝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爷爷的身上找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 第四章：温家宝转行当教师就能拯救中国教育的沉沦吗？

温家宝出身教育世家，对教育别有一番感情。跟李鹏、朱镕基等前任总理相比，温家宝经常出入于从小学到大学的校园和课堂，以此显示对教育界无微不至的关心，也顺便卖弄一下自己有当老师的天赋。确实，温家宝本人的气质像是一个历经政治运动之后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中小学老师，而与“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总理相差甚远。如果说温家宝权力有限，对中国全局性的问题没有决策权，但至少在教育领域做一些有限的改进和修补，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但是，尽管温家宝口口声声说要振兴教育，在其任内，中国教育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倒大幅倒退。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高等教育一泻千里，基础教育奄奄一息。告密风、剽窃风、奥数风、下跪风、假学历风，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

温家宝倒是时常出没于大中小学的课堂和图书馆之中，与师生零距离亲密接触。但接触之后，大中小学的问题依旧。总理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假大空。即便是温家宝留下来，转行当教士，就能拯救中国教育的沉沦吗？“乾坤大戏场，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鉴，对影休推身外身”，一个大国总理，只知道像梅兰芳那样的舞台上搔首弄姿，可谓不务正业；一个大国总理，在各种公开场合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地说谎话，可谓无耻之尤。愚弄成人倒罢了，愚弄孩子则让人忍无可忍。

#### “从容淡静”就可以让中国教育“化险为夷”吗？

有一次，温家宝在山东视察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的时候，来到费县的一所中学，移步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课堂，并受邀为学生们讲授《后汉书》之《张衡传》。新华社如此记述温家宝的课堂上越俎代庖的言行：温家宝站起来，拿起课本给大家讲道：“讲一篇传记文应该抓住几个重点。一是张衡的贡献。他发明了地动仪，早于欧洲一千七百多年。二是他的家世。

张衡出身宦宦之家，却无骄奢淫逸的恶习，这十分难能可贵。三是他的学识。课文里短短几句话反映了他的好学不倦和学识广博。四是他的为人。『从容淡静』，意味深长。五是他的处世。不好结交俗人，但又不自傲。总之，这篇文章很好，文字很美、很简洁，给人以深刻启迪。”

温家宝显然是有备而来，否则不会如此侃侃而谈。看到他在课堂上的精彩表现，正在上课的语文老师恐怕也要自叹不如吧？我不禁想起了旧时戏台上的一副对联来：“你看这般人，以假作真，才上台就变脸色；他因那件事，非名即利，未出脚煞费心机。”这两句话足以概括温家宝的政绩。温家宝多次到大中小学的课堂去旁听，并亲自为学生讲课，看来他真该转行去当教师，华叔（司徒华）领导的香港教师协会，说不定会授予他一个名誉会员的称号呢。

温家宝的文化素养远非李鹏之类的草包可比，但是一个适合当中小学老师的人占据总理的高位，对国家而言，显然是祸非福；正如曾荫权以打工仔的心态当特首，对香港而言祸非福。温家宝赞赏张衡“从容淡静”的性格，这倒与他本人有些相似。然而，面对今日中国“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顾炎武）的现状，需要的不是一个“从容淡静”乃至如老僧入定般的守成型的总理，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地割除溃疡、根治腐败、推动政改、赢得新生的开拓型的总理。转型时代的中国，总理应当要有大胸襟和大气魄，顺应历史潮流，吸纳主流民意，而不是像一个中学教师一样照本宣科、谨小慎微。素餐尸位者本身就是犯罪，总理像教师本身就是悲剧。

温家宝若对政治体制改革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在本可有所作为的教育领域，仍然坐视教育界的直线沉沦呢？他需要做的，不是装模作样地到小学课堂上去给孩子们讲授语文课，而是直面如下这些事关中国未来的教育议题：义务教育形同虚设，乡村基础教育日渐凋敝，“留守儿童”问题越发严重，城市中小学教育“减负”变成“增负”，畸形的“奥数竞赛”戕害青少年的心志，大学极度腐败和缺乏学术自由……在他的任期内，他作出过哪些拯救中国教育而努力呢？

以大学而论，教育部宣称，为在未来十年之内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推出百位校长赴欧美日等国培训计划，每期二十四天，培训费、往返旅费和培训期间的食宿交通等费用由国家专项经费全额支付。对于这个计划，温家宝不会又被蒙在鼓里吧？有网民质疑说，在短短二十四天之内，这些校长出国培训到底有何效果？该计划与其说是出国培训，还不如说是出国旅游。香港《东方日报》也评论说：“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吹出来的，更不是用钱堆出来的。与其花费巨资让校长出国潇洒游，还不如将这些资源拨给西部农村的学校，加固校舍，避免『豆腐渣工程』对下一代的残害。”温家宝有没有听到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接受善意的建议呢？

“从容淡静”并不能让中国教育“化险为夷”。温家宝不必转行当教师，不必到大中小学的课堂和图书馆里作秀，作为总理，他应当做的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努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遏制教育腐败，保障学术自由。

### 北大沦为亚洲二流，温家宝该负何责？

二零一零年的两会期间，温家宝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十位代表座谈的时候，说了一番让人们大跌眼镜的话：“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从刘晓波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反动语录”呢。温家宝真的是政治局中孤独的异议者吗？温家宝难道要以推动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为突破口，在其任期最后两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吗？

如果温家宝说的是实话，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撤销所有大学中的党组织，让共产党的归共产党，让大学的归大学。然而，温家宝话音刚落，北大社会科学部便发出公告，撤销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和北大宪政研究中心。



此次被撤销的四个中心当中，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最先引起外界关注。这两个中心的研究人员中，有沈岍、王锡锌、陈端洪、姜明安四人参与了二零零九年的“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废改《拆迁条例》”事件。此上书迫使国务院作出响应，有关官员邀请几位教授座谈，似乎颇有纳谏的度量。然而，他们服务的研究中心随即被关张，在网上一篇名为《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的结局：他们的研究中心被北大撤销》的帖子迅速流传。

而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则是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十五年来，该中心被称为妇女维权的典范，媒体对此颇多笔墨。该中心曾被《财经》杂志、《南风窗》杂志等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之一，该中心的主任郭建梅亦曾获得美国“二零零七全球女性领导者奖”、法国“二零零九年度波伏娃奖”等。郭建梅说，对于北大的决定，她感到“透心儿凉”，“别了，北大，但我们将继续推动中国的公益法律事业。”

难道北大校方有胆量跟“人民的好总理”对着干？或者说，北大根本就不受温家宝政府的教育部的管辖？这一声“苍凉”的“别了，北大”，不是郭建梅的遗憾而是北大的遗憾。北大自蔡元培时代以来，便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传统，比如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平民教育等等。北大也一直是社会政治的监督者和批判者，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就是“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此次北大悍然关闭四个 NOG 机构，显示出北大校方献媚权贵、不容异议的丑陋面孔。这一做法终究会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一大败笔。

如今，北大已经沦为亚洲二流。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 QS 公布的二零一零年亚洲大学前两百名最佳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排名第一，北大排在十名之外。北大的沉沦，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学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官僚化。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说过：“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学术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由于这种意识是大学的基本目标，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这种探究和表达的自由。”今天热衷于向官员和富商卖文凭的北大，打压在课堂上说真话的教师的北大，还有什么颜面以中国的“最高学府”自居呢？

中国教育的沉沦，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向大学各个层面蔓延，教育的败坏是政治的败坏的首要牺牲品。而北大的败坏则是整个教育败坏的先锋。温家宝不会不知道北大的沉沦，他也像李敖造访北大的时候那样，对北大校领导说了几句嘲讽的话。但是，他却没有制止北大校方关闭若干研究中心的恶劣决定。这就表明他对大学“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温家宝的不作为，是因为他将自己的职位看得比中国的未来重要。

### 第五章：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每年的五四青年节，国家领导人北大去慰问形成了一个传统。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每逢这天总是警察云集，如果领导人到图书馆，则图书馆封闭；如果领导人到某教学楼，则此教学楼封闭。领导人的礼贤下士之举，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造成了相当的干扰。当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沦为领导人作秀的配角的时候，不知是北大的荣耀，还是北大的悲哀？

二零一零年的五四青年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度莅临北大，先后视察学生义务工作的情况、到图书馆与学生互动对话，以及在食堂与学生共进午餐。温家宝说，这是他总理任上第三次到北大视察。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温家宝跟学生说的话，无非是“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之类的老调重弹。殊不知，中共就是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状的始作俑者。中国要实现比阳光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就非得去中共化不可。

然而，温家宝的“三顾秀”，真还有不少捧臭脚者。比如，北大的毛派教授孔庆东便在其博客中写道：“五月四日，温家宝总理亲临北大，我的学生陈灏庐有幸跟温总理握手并交谈，随后许多同学都抢着来握陈的手，沾点福气……”关于奴才，没有比这段文字更好的定义了。读到这样的垃圾文字，宛如身处文革时期个人崇拜的高潮，真不知今夕是何夕。

这次北大之行，还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插曲。有学生在网上发帖透露，温家宝在



一个半小时的对话会上突然说：“我这次来就交代过学校，不要刻意安排，我一来就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他转向正欲解释的北大校长周其凤说：“不是说你。”温家宝继续说：“以前我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坐在我身边的学生，我一问，不是学生会主席就是其他的学生领导。不用说，肯定是安排的。”这番话博得全场的笑声和鼓掌，也赢得了互联网舆论的关注和议论。有人甚至继续将这个插曲解读为温家宝公开表示自己是政治局中的孤独侠，并挑战政坛弄虚作假的潜规则，甚至将效法胡耀邦和赵紫阳推动民主改革……在我看来，这些望穿秋水的期盼，最终将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 温家宝应当见“三博士”

温家宝这次当面揭穿北大校方的“精心安排”，并非表明他要“脚踏实地”地走向民间，而只是演出一场“戏中戏”罢了。倘若温家宝真有心打破层层封锁与伪饰，以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大可不必停留在一句空话上，完全可以身体力行，一抬腿就走进一间学生宿舍，听一听普通学生的心声。他还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排见一些值得见的人。比如，当年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止收容遣送条例的“北大三博士”。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滕彪、许志永、俞江三位北大法学博士，将一份合力写成的名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启了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当时，《法制日报》评论说：“三位博士的行动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公民宪法意识，表现了民众要求法治的责任感，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从中我们可以听到我国民主法制前进的匆匆足音。”

三博士的上书引来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半个多月后的六月九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作出一审判决，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六月二十日，国务院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救助的自愿原则是此次变革的关键。

七年之后，在当年的“三博士”当中，滕彪和许志永仍然奋战在维权活动第一线。在维权律师群体中，滕彪和许志永是温和、理性而坚韧的佼佼者。滕彪挺身而出，为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等人辩护，开罪了权势阶层，最终被吊销律师执照、没收护照，不仅受到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下令停课的压力，而且常常遭到国保特务的监控甚至绑架、殴打。而许志永则参与成立了NGO组织“公盟”，帮助访民等弱势群体维权，后来也被当局取缔和查抄，许志永本人被抓捕入狱数月，之后才被释放。在北大“六四后一代”的毕业生中，滕彪和许志永堪称少有的理想主义者，本来以北大博士的学历，他们可以成为富有的律师和教授阶层，但他们选择献身民主自由事业，并付出了巨大代价。

所以，温家宝倘若真对中国的公平正义挂心，真对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怀有敬意，就应当在“五四”这个特殊的日子会见这“三博士”，鼓励与支持他们的事业，并号召其他北大学生也投身推动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事业。同时，这也是向党内外、向全国民众传递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然而，温家宝并没有这样做，他既没有这样的气魄与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见识与胸襟。

### 温家宝应当见“五教授”

尽管北大这些年来在官与商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但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民主自由的火种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大既有三名好学生，还有五位好教授。这些年来，北大固然出了孔庆东、孙东东之流的学界败类，也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居陋室，心怀天下”的“三博士”和“五教授”。温家宝造访北大，除了会见“三博士”之外，还可以会见“五教授”。

“五教授”为何许人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北大的沈岍、王锡梓、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等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建议。近年来，血腥拆迁成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代名词，从北京奥运会一直拆到上海世博会，偌大

的中国，怎一个“拆”字了得！在西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住宅，在中国任何一个拆迁工作人员都可以闯入，甚至被推土机摧毁。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中的坦克，到如今遍及全国的推土机，中共对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漠视，一以继之。在此意义上，中共从一诞生起，从来就是一台开动之后停不下来的杀人机器。

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中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条文，但各级政府从来都视若无物，即便民众愤而自焚，他们也不停止一刻。于是，这五位教授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明文规定”入手，螳臂当车，力阻狂轮。他们建议从修改“拆迁条例”入手，将纠正违宪制度实际运作起来，他们在建议书中写道：“现行宪法已经实施二十七年，《立法法》已经实施九年，但我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从来未审查和撤销过一个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我们的《宪法》和《立法法》设计和确定的法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一直在『睡觉』，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这与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治国方略是违背的。因为没有违宪、违法审查，就没有对政府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制约，就没有人权保障。”

他们的建议书发表之后，反响巨大。国务院法制办和人大法工委先后邀请五位学者座谈，确定将修改近年来屡遭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然而，三个多月之后，北大却宣布关闭这几位学者任职的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虽然北大方面再三解释，却无法消除人们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联想。那么，温家宝为什么不利用造访北大的良机，会晤这五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北大教授呢？如此，即可表达对关心国事、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与赞赏。温家宝为何不这样做呢？

### 政府盗贼化，大学亦盗贼化

朱熹曾经说过：“今日上之人分明以盗贼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中共是一个盗贼性格的统治集团，因此大学也被中共改造成一个奸盗社团。如今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像乌烟瘴气的官场。那些拱卫在温家宝四周的年轻学生，每个都是人格分裂、口蜜腹剑的学生官僚和中共未来的“接班人”。此次温家宝的北大之行，与这些过于聪明的学生“假交流”，而不见“三博士”与“五教授”，只能说明他连李鸿章当年所说的“裱糊匠”都算不上。他除了说几句漂亮话，除了像京剧演员那样甩甩袖子，一点实际的努力都不曾做过。他用“脚踏实地”四个字来鼓励北大学子，他自己何时“脚踏实地”过呢？

温家宝当政以来，中国大学扩招的大跃进运动变本加厉，所留下的后遗症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痊愈。在五月初的一场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指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斯在质量建设上。美国《彭博商业周刊》也指出，中国的教育系统无法为学生在全球化的挑战中打好根基。日前，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在一次论坛上说，中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这三个方面北大都没有做到。可惜的是，许智宏在卸任之后才敢说几句这样的真话。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者熊丙奇亦认为，中国大学的当务之急并非从数字指针上向一流大学靠近，而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严格一点说，中国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

近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水平以可怕的加速度沦落。大学之间的竞争不是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而是教育经费和行政级别。在畸形的体制下，行政指挥学术，学术献媚权力，大学走向官场，教授变成“叫兽”。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教育部长周济，虽然灰溜溜地下台了，却又立即“梅开二度”，转任中国工程院院长。而对此负有更大责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却毫无反省之心和亡羊补牢的行动。

假话说了一万遍也不能变成真理。温家宝的骗术已经黔驴技穷了。我在推特上看到，人们将一句意有所指的话送给总理大人：“温家宝与北大学生共度『五四』，广大学子纷纷表示，

欢迎总理下个月再来!”

## 第六章：做官与做事——笑看温家宝与浙江大学学生的对话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混世”的官僚。对于此类官僚，台湾作家柏杨在《白话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种定义——“巨混”。东晋时代的宰相王导便是一名“巨混”，柏杨评论说：“王导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官场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坚持使用亡国的方式治国。他追求的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对内脏的溃烂，视若无睹，因为他就是使内脏溃烂的主凶。他反对改革，并且用儒家恐惧改革的心理，对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上行下效，长此以往，整个官僚体制和民间舆论也都对迫在眉睫的种种麻木不仁了，“当人们习惯于和稀泥的政治运转方式时，就找不到国家衰弱的第一因，所以对王导一直保持敬意”。

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如果将“王导”换成“温家宝”，是何等贴切。尽管有那么多“八宝饭”为温家宝鼓吹，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温家宝有哪些“可爱”之处。明明是一个“巨混”，却成为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好人”。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循环的历史，正是“人情到底好排场，耀武扬威，任你放开眉眼做；世事原来多假局，装模做样，凭吾脚踏实地看”。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资治通鉴”的领导者，少之又少；而拥有一双“火眼金睛”、看透官僚素餐尸位的本性的老百姓，亦同样少之又少。

“要做事不要做官”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浙江大学的图书馆里，同学们正在看书学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刚刚结束在杭州一天的视察走访，从天而降，走进图书馆。新华社如此报道当时的场面——

温家宝说：“我今天晚上是突然袭击。”

一名学生说：“太突然了！”

温家宝说：“我六点多才回来，书记省长问我有安排没有？我说没有。然后吃完晚饭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要到浙大去！我主要是惦记你们，来看望你们。”

温家宝说，浙江大学的老校训是“务求实学，存是去非”，求实是基础，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现在。同学们要有无穷的求知的欲望，要做踏实的功夫。不骛虚声、不求虚名，惟以科学的态度做踏实的工作，这些都可以作为理解你们校训的格言，终生受益。

大三学生汪寅龙对温家宝说，他想从政，想做像总理一样为老百姓服务的人，想请总理给他一些建议。

温家宝说：“要做事不要做官。”

这段精彩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一个多月前，温家宝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造访北大，在北大图书馆中对学生们说，他知道在场的学生不是学生干部就是学生党员，是校方周密安排的结果；那么，此时此刻，他在浙大见到的这些学生，也不例外——就在他去浙大的路上，上至书记省长，下至校长院长，就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精心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温家宝的“突然袭击”，一点也不“突然”。

这名梦想从政而向温家宝寻求建议的大三学生，倒是说出了心里话。这年头，当官是青年学子趋之若鹜的终南快捷方式，中央部委的一个公务员职位，居然出现千人报考的奇观，真是鲤鱼跃龙门。

而温家宝的回答则一点也不够坦诚。清末的“太平宰相”，也堪称“巨混”之一的曹振鏞就比温家宝真诚得多。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载，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

温家宝从中办主任爬到总理的位置，是中共历届中办主任中少数“修成正果”者。宦海沉浮数十载，服侍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四届总书记而“不倒”，温家宝必有一套



心得体会。但这套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看不到的权谋术，温家宝没有像曹振鏞和曾国藩那样轻易示人。面对这名求知若渴的学生，温家宝不说人话，专说官话和套话，以“要做事不要做官”七个字来搪塞之。

这七个字其实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记载了李鸿章谈的一句话：“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作为首席公务员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的温家宝，心里也清楚地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小官员，大都是些不做事、白吃饭的“残次品”而已。此时此刻，温家宝劝大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是不是让大学生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其中也暗含了忏悔之意呢？

### 老百姓会记得温家宝吗？

刚说完这七字箴言，温家宝立即又有一番阐释。他最喜欢将“老百姓”挂在嘴边，就好像残害了数千万人民的毛泽东偏偏要题写“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一样。温家宝以苦口婆心状对浙大的学生们说：“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什么专业，都要用你所学的专长为人民服务，你这样做了，而且做了贡献了，人民会记住你的；相反，如果你即使当了官，但是你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做官而做官、甚至背离老百姓的利益，那对人民是有害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应该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也应该脚踏实地去实践。如果是这样的政治家、这样的官，老百姓是欢迎的。”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温家宝的理想是当一名能够“被老百姓记住”的良相，所以他随时随地都要表现得有“爱民如子”之心。温家宝习惯于使用“老百姓”这个词语，而很少用“公民”这个词语，这背后是一套帝制时代的“君父”和“青天”的价值观念。因为“老百姓”是任由当权者摆布的对象，而公民不仅有选举执政者的权利，还有罢免执政者的权利。温家宝当然愿意中国人都是“老百姓”，而不是“公民”了。由此可见，温家宝的价值观念实在是远离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文明。

温家宝虽然是工科出身，但他苦读了不少名人名言和诗词集萃之类的书籍。每当举办大型记者会或深入民间视察的时候，也是其大肆晒书的时候。在二零一零年“两会”闭幕的记者会上，他便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口吻说：“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然而，我要反驳他的是：是的，你们很爱这个国家，所以，没有一片土地未曾遭到你们的污染，没有一条河流未曾遭到你们的荼毒。更可怕的是，没有一颗人心未曾遭到你们的戕害。这就是你们特有的对国家和人民示爱的方式吗？你们就是这样让老百姓记住你们吗？

温家宝这位自称信任人民同时也被人民信任的总理，唯有到西方国家访问的时候，才可能遇到流亡在外的“人民”的抗议。有一次，温家宝访问英国，在出入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的时候，他行走在上百名守护人员用黑伞组成的“仪仗队”之中，那些在街道上抗议的“人民”，既然看不见，就当它们不存在吧。温家宝看得见的人民，是那些国内的、对他感激涕零和三呼万岁的人民。于是，他便想当然地认为人民愿意让他维持权力。

### 温家宝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吗？

温家宝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曾经反驳过一些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进度的质疑，他说：“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害怕民主和选举，但中国领导人都很明白『只有信任你的人民，人民才会愿意让你维持权力』的道理。”中共高官不谈民主则已，一谈民主必定一鸣惊人。胡锦涛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回答一名日本小学生的疑问时也说过，是人民选他当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吗？我也是“人民”之一员，怎么从来没有投过票呢？我总算明白了，中国不是一个冉云飞所说的“比傻帝国”，而是一个比赛谁更无耻的国家。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过，士之无耻，可谓国耻。那么，总理的无耻，就更是国耻了。

有人说，我们不能对温家宝“这一个人”作过高要求，所有的问题都应当归咎于体制；



但是，既然温家宝自己搬出了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自诩，我们当然也可以拿这个高标准来要求他。体制固然僵硬，但温家宝连最低要求都没有达到，比如尽可能地少说谎，比如尽可能少地用莫须有的罪名审判良心犯，比如向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和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温家宝做过这些并不会立即危及到他的地位的事情吗？迄今为止，他一件都没有做过。那么，批评这个如此不尽责的总理，乃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在。

又有人说，温家宝是一个老好人，只是有心无力，大家不必太苛求他。这种貌似宽容的说法实际上是极其有害的：如果一个邻家的老大爷缺乏基本的是非善恶观，每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是他的个人的选择与权利，无须指责之；但是，作为正在“出三峡”的惊涛骇浪中艰难转型的大国的总理，如此庸碌而伪善，任意挥霍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转型的最后机遇，则必须接受民众之质疑与批评。

“于己不欲，勿施于人”，温家宝所做的，与他所说的截然相反；温家宝期望年轻学生们去做的，也与他当下正在做的南辕北辙。胡温当权以来，民众的权益受到强权变本加厉的侵犯。当局钳制舆论，纵容暴力拆迁，以巨资维稳，均是反民主、反人民的表现。温家宝是这个庞大的专制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的“要做事不要做官”的七字箴言，让我想起了旧时戏台上的一副对联：“你也挤，我也挤，此地几何立脚地；好且看，歹且看，大家都有下台时。”可惜，那个向温家宝索取“当官锦囊”的、不谙人事的大三学子，无从领悟个中之深意。

### 第七章：偽善是溫家寶與季羨林最大的共通之處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产之后，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季羨林遂充当了一名爱国主义的典范。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季羨林说：“两者缺一不可。”温家宝说：“我给华侨讲时，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季羨林趁机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温家宝说：“好，我回去以后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毛遂自荐”，不惜直接要求当权者干涉小学教材的编辑工作，这也太不符合儒家“谦谦君子”的风范了。而温家宝的“反映”当然是不会没有效果的，果然，季羨林的一篇题为《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学语文教材。

人的母亲只有一个，将国家和政府当作母亲，是对自己的母亲的羞辱。季羨林留学德国十年，难道没有听过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名言吗——“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国文化带到哪里。”当所谓的“祖国”羞辱和逼迫母亲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呢？法国作家加缪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在祖国与母亲之间，我选择母亲。”而季羨林的选择是相反的：他声称爱母亲，其实他爱的是权力，他何曾爱和关切过天安门母亲呢？杀死这些母亲的孩子的，不正是共产党政权吗？季羨林也曾在八九民运中的一份知识分子的声明上领衔签名，那么多被杀害的孩子，那么多失去孩子的母亲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抗争，难道他全都忘记了吗？

温家宝还谈到了季羨林送给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颂》。温家宝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您大概从小就对泰山很喜欢？”季羨林说：“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温家宝说：“对，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民族颂。”季羨林说：“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托。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脔，历代帝王都喜欢通过泰山封禅的活动来巩固皇权和增强“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羨林要么是对中国的历史常识极度无知，要么就是故意以此来谄媚当权者，将当权者当作帝王顶礼膜拜，这种“士之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后不久。温家宝对季羨林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

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季羨林立即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这不是受虐狂吗？既然季羨林认为灾难对自己是有益的，就应当感谢“文革”，感谢“牛棚”，大声疾呼再来一次！又何必在《牛棚杂忆》中发出种种抱怨呢？既然温家宝认为灾难可以让我们这个民族“愈挫愈奋”，那么视察灾区的时候，又何必挤出几滴眼泪来呢？你们在这里轻松地谈论灾难的“正面效应”，我却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们的家长们，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的观点。多难从来不会兴邦，但极权主义政权会利用各种灾难来巩固自身之统治，就如同斯大林当年利用纳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独裁的程度一样。

温季合作的爱国“二人转”可休矣。季羨林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正值纳粹兴起、希特勒上台，我怀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则，他怎么会在《忆往述怀》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种爱国不正是纳粹所鼓吹的那一套吗？那么多德国的年轻人，正是在这种爱国魔咒的驱使下，走向战场，疯狂杀戮，最后自己也成了炮灰。对此，冉云飞尖锐地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

季羨林算是老北大人了，当年他曾经与胡适共事，难道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吗？胡适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与季羨林的“爱国没商量”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民国时代生活过的老辈学者中，季羨林本是平庸之辈，唯一的优势就是活得比较久罢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以长寿的优势终于等来了一顶辞也辞不掉的“国学大师”的帽子，简称为“国师”。

### 人格分裂的伪君子

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官方最热衷于打造道德完人。季羨林乐于被温家宝当作圣人、乐于被共产党塑造成圣人。温家宝与季羨林的合作，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一次，温家宝特意带了一件小礼物送给季羨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画，上面有激光“刻印”的温家宝和季羨林在一起的画像。这是一个自恋者向另一个自恋者的致敬方式。温家宝说：“这上面还刻了一句您最喜欢的话：真情。您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季羨林说：“对，『三真』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可是，诚如圣经所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遑论圣人了。季羨林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季承便在《我的父亲季羨林》一书中写出了“一个人生失败者的父亲”以及“一个人生失败者的丈夫”的真相。季羨林表明上很清高，其实“他好名，给他一百顶帽子他都戴上”。另一方面，季羨林对家人极端冷漠甚至冷酷，从未没有爱过妻子，也没有爱过儿子、女儿。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当作“悲剧人物”，并且坚信“这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 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季羨林喜欢养猫，似乎对猫颇有爱心，但他除了带猫出去散步，给猫喂点牛肉、猪肝之外，根本不管其他。那时，他的母亲和妻子年龄都很大了，还不得不在照料他之外，为他照料那些猫，为此累得筋疲力尽，甚至引发“家庭战争”。在这种畸形的爱的背后，是何等的自私和无情啊！

这位国学大师至死也没有参透死亡，季羨林“希望活到『茶』寿，更希望永远活下去”，然而大师的夫人却早有“死了干净”的想法。所以，有人说，季羨林是“有国无家”，可是，没有家，哪来的国？一个爱家的人，在公共领域中，不一定就是个好人，比如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就很顾家、很爱妻儿；但是，一个连家都不爱的人，他所声称的“爱国”根本就是肥皂泡一样的谎言——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又如何爱那些组成国家的、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同

胞呢？

儒家文化再加上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必然盛产人格分裂的伪君子。钱钟书是如此，季羨林是如此，余秋雨亦是如此。季羨林在私人生活中真面目，已经呈现出冰山之一角。而温家宝在私人生活中呈现为什么形象，寻常人等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但基本上可以想象出来。季承给家庭中的父亲打六十分，我则给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季羨林打三十分。温家宝的得分大致也差不多吧。温家宝对季羨林说：“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最近，我看您讲良知、良能。我认为，这是知和行的统一观，也是人的品德和能力的统一，这个思想很深刻。”季羨林立即顺着杆子往上爬：“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温家宝立刻谦虚地说：“我们做的不够，还要多努力，把工作做好。您也要把身体保重得更好，多看些年。”温家宝将季羨林当作说真话的人，季羨林也真的认为自己是说真话的人，这本身就是和谐中国最大的谎言。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刘晓波，是谭作人，是陈光诚，是师涛……可是，他们都在哪里呢？他们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可见，共产党如此地仇恨和害怕真话，因为共产党的统治是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

如此对话，真是将肉麻当有趣到了极点。而将其整理出来发表的记者，当然不会这样认为，也许还有许多读者真得读得津津有味，甚至“临表涕零”。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这个柏杨所说的“大酱缸”，何时才能被打破呢？

### 第八章：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代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正说明此一时代的终结。因此，我坚信希特勒之流必永远受到人类的唾骂，这是他得到的阿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

东汉时的昏君汉灵帝准备兴建规模宏大的御花园，宰相杨赐上书劝阻。灵帝打算停工，询问身边的宫廷侍从任芝、乐松的意见，两人回答说：“从前周文王的御花园有一百华里，人们认为太小；齐宣王的御花园只有五华里，人们认为太大。所以，御花园实际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王是不是英明神武。如果一个君王足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大，老百姓也不觉得大；如果一个君王不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小，老百姓也觉得大。今天，陛下是如此英明神武，修建御花园只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称赞，当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除外。”灵帝听了这样的马屁，龙心大悦，乃下令继续动工。而阻止修建御花园的杨赐的下场如何，可想而知。作家柏杨在评论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叹说：“任芝、乐松的言论，使我们再见文妖。截至二十世纪为止，宦官已绝，而文妖不绝，倍增痛心。”我则跟着评论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文妖和重用文妖的权贵呢。

#### 那条送给温家宝的围巾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在江苏考察的温家宝，来到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内，温家宝面对几千名学生发表演讲。当时，气温已经接近零度。也许是天寒地冻的缘故，看到总理不远万里来“送温暖”，一名同学上台将一副长围巾送给总理，说：“这是我送给您的围巾，请您戴上，您一定要注意身体啊。”随后，媒体大肆报道此感人一幕，以凸显“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新华社报道说，这名学生送给温家宝的围巾乃是其亲手编织的。我总是怀疑这个细节。因为如今的年轻人大都眼高手低，很少有人能够掌握复杂的编织技术。也许，这家职业学校



专门设置有编织方面的专业，这名学生正是编织专业的学生吧。还有自诩为“八宝饭”的人在网上评论说，这是“一片真情，万金难买”。记得少年时候，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经常出现关于周总理的类似的故事，道具是衬衣、手套等等，或是总理送给百姓的，或是百姓送给总理的，以此凸显总理爱民如子，百姓爱总理若父。如今，温总理与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几乎可以同周总理相媲美。美国总统布什被人砸了坚硬的皮鞋，我们的温总理却获赠温暖的围巾，谁是好领导，谁得到人民的爱戴，不言而喻。民国总统，可要羡慕死中国总理了。

然而，这个感人的故事，让我感到实在是太过离奇了。以温家宝所享受的“一级保卫”，若非寻常人等，焉能挤到他的面前去送上围巾？温家宝的每一项视察计划，都是中央和地方当局精心设计的，可以说丝丝入扣到了以每一秒计算。前来聆听温家宝教诲的数千名学生，无不经过挖祖坟式的履历审查。这样才能确保现场不会有人放肆地向总理大人扔鞋子，更不会有杨佳式的青年突然之间“脱颖而出”，而个个都是被总理的讲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好孩子”。

所以，送围巾的这个细节，必然在事先的安排和设计之中。“温办”的主任，肯定是这个仪式的总导演，地方官员，学校校长，都是参与策划者。这是一群无耻的“文妖”。谁去送，如何送，送的时候该说什么话，早已排练过了不知多少次，烂熟于心了。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北大发表演讲，那几名提问的学生，事先都经过反反复覆的演练。演练的过程，居然还拍摄出来，还在校园电视台播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如戏”和“戏如人生”。

这一次，最入戏的不是那个献围巾的学生，而是接受围巾的温家宝。那个学生只是客串的演员，而温家宝却是专业演员和终身演员。温家宝真的需要围巾吗？尽管金融风暴已经波及到中国大陆，“人民的好总理”感受到了刺骨的凉意，但总理夫人垄断珠宝行业，浑身珠光宝气，总理大人自然不缺围巾戴。那么，总理为什么又不戴围巾呢？他就是要踏破鞋、穿旧衣，以此显示“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李鹏当总理时，经常裹着法国顶级品牌的时尚围巾，以工资而论，他一年的工资也买不起一副这样的围巾。而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之“一姐”李小林，骄傲地对记者说，这是她送给老爸的礼物。结果越抹越黑，李鹏更受民众之厌恶。想来，温家宝吸取了李鹏的前车之鉴，即便再冷也不会如此“披挂上阵”。这样，还可以给身边的“文妖”们一个编排“送围巾”的好戏的机会。一个重用一群“文妖”的领导人，能有几分的真诚呢？

真正需要围巾的不是温家宝，而是刘晓波。因为《零八宪章》而被捕入狱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是为所有的中国人坐牢。他失去自由，是为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这位只身挑战中共专制制度的勇士，才配的上热爱自由的同胞们用爱心编织的围巾。然而，那些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的莘莘学子们，既不知道什么是《零八宪章》，也不知道谁是刘晓波。即便知道了，他们也不会将围巾送给刘晓波。他们年纪虽小，心智却早熟，他们知道将围巾送给谁可以换来千百倍的好处。

### 温家宝的打油诗是如何成为大学校歌的？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闻网注销消息：经学校党委会研究决定，北航校歌正式确定为《仰望星空》。校歌选择温家宝的诗歌《仰望星空》为歌词，邀请沈阳音乐学院的艺术家用进行音乐创作，“校歌的确定标志着北航的精神文化体系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北航精神、办学理念、校训、校风、校歌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及创新特质”。

北航新闻中心主任蔡劲松表示，北航之前没有校歌，学校在二零零六年就开始校歌征集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作品。一年多前，有很多师生和校友提议将温家宝总理二零零七年九月四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诗歌《仰望星空》作为北航校歌的歌词。虽然这首诗歌并不是为北航所写，但北航师生认为这篇文学作品的意境和北航的精神和发展目标非常契合。



北航官方网站上称,《仰望星空》这首诗,意境阔大而深邃,格调宁静而致远,读起来令人动容、回味无穷,特别是对北航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义,将激励北航人树立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激发北航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科学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四月二十六日,北航的书记和校长代表全校师生给温总理写信并附演唱光盘,让总理阅知北航师生确立校歌的夙愿。

看来,胡温向来亦步亦趋,如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一个是万岁,一个是九千岁。胡锦涛在玉树灾区一所学校的黑板上题写“校园,会有的;家园,会有的”等几个字之后,这件“无价珍宝”立即被一群文妖“请”进甘肃省博物馆,并投入巨资研究如何将这两行胡锦涛随手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字永久保存下来。我想,他们既然认为这块小黑板已经跟卢浮宫中的《蒙娜莉萨》一样伟大,不妨就仿效《蒙娜莉萨》的保护措施,在其外部安装一套特制的防弹玻璃。温家宝紧紧跟随胡锦涛,当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他写的“多难兴邦”未能及时保存下来,那么就只好在《仰望星空》上面下功夫。不仅要让这首打油诗家喻户晓,还要将其谱曲传唱,甚至定为大学校歌。

有人说,《仰望星空》成为北航校歌,只是下面的马屁精们单方面的作为,并非温家宝的本意。因为温家宝从来都谦虚谨慎、朴素真诚。但是,新闻报道显示,温家宝对自己的作品被定为北航校歌不是一无所知,北航方面早已将此事呈送到总理府的案头,温家宝在百忙之中也一定“阅知”了。

媒体没有报道温家宝收到北航请示信件的具体反应,但半个多月之后,北航校方公布了这一决定,就足以说明温家宝即便不是“笑纳”之,至少不是“反对”。否则,如果温家宝奋起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温家宝对这种个人崇拜的歪风邪气感到不满,稍稍透露一丁点意见,下面的人哪里还敢继续大张旗鼓地宣扬此事呢?他们只能偃旗息鼓、默不作声。

所以,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单单有下面的人喜欢拍马屁,而没有上面的人乐于接受马屁,马屁精必定不会满坑满谷;单单有一群文妖挖空心思媚上,而没有好大喜功、踌躇满志的当权者,文妖当然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 第九章：影帝的配角们

翻译家、诗人杨宪益先生有诗云:“江山今日归屠狗,冠带当朝笑沐猴。”一语道破天机,今天的朝廷,从堂堂宰辅到九品芝麻官,都在忙着演戏。影帝固然演技炉火纯青,但偌大的舞台上,如果仅有影帝一个人出场,亦不足以打动观众。所以,影帝身边,必须有大大小小的配角,起烘云托日之效果。温家宝喜欢的是哪些配角呢?

### 误将李鬼当李逵的吴仪

“铁娘子”吴仪先后在朱内阁和温内阁中担任副总理,先是温家宝的工作伙伴,后是温家宝的得力副手。有一次,吴仪到上海考察的时候,在会议上批评台湾著名的连锁食品企业“永和豆浆”,指她在上海松江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一家“永和豆浆”的质量和卫生条件都很差。

吴仪对“永和豆浆”声色俱厉的批评,被各大媒体大幅报道。事后,“永和豆浆”的老板林炳生大声“喊冤”,上海当地的官员也“一头雾水”,因为松江根本就没有永和豆浆的分店。很明显,吴仪到的是一家“李鬼店”。林老板强烈要求“一定要找出元凶,还永和豆浆一个公道”,但上海官员却对他说:“我们总不能说吴仪副总理弄错了吧?”

即便贵为副总理,吴仪也是一个会犯错误的、有限的人,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既然犯了错误,就应当道歉,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果关系。然而,被誉为“开明派”的吴仪,在这一点上也和中共的其他高级官员一样:闹出了一个乌龙事件之后,为了面子的缘故,不向被冤屈者道歉。

官大一级吓死人。在中共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内,谁的官大,谁就占有真理。中共一向

喜欢标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际上，真理永远只是当权者的独占品。有了权力，便可以指鹿为马，便可以颠倒黑白。此种情况，于今为烈。

在古代，即便是五之尊的皇帝，在遇到天灾时，亦不得不发表“罪己诏”，承认这是上天对自己施政不佳的惩罚，希望以此获取老百姓的谅解。但是，中共掌权之后，先后制造了“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政治运动和血腥屠杀，致使中华大地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中共却从来没有公开承认错误，更是拒绝向民众鞠躬道歉。

吴仪不仅应当向“永和豆浆”道歉，还应当向所有的消费者道歉。当时，吴仪刚刚接替死去的第一副总理黄菊，并兼任“全国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当然有责任确保老百姓都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当然有责任打击乃至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冒牌店。但是，近年来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发生，让吴仪焦头烂额、防不胜防。在此次卫生检查中，吴仪居然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店、哪一个是假店，连副总理阁下都“反认李鬼为李逵”，一般老百姓又焉能分清呢？而且，她在没有经过调查和甄别的前提下，便轻率发表论断，伤害的是一个名牌企业的声誉，羞辱的是自己担任的副总理的职务。

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海外有那么多人对温家宝内阁中的“女一号”吴仪赞不绝口？连香港评论家董桥也盛赞吴仪魅力无穷，赞誉之语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吴仪让人想起物理女皇吴健雄婉约中的刚毅，想起城南之花林海音古典的现代：她们都是梨树下紫砂壶温的碧螺春。”我左看右看、前思后想，怎么都没有在吴仪身上发现有丝毫的个人魅力。在其任上，吴仪可曾有过一句支持民主的言论？可曾向数十万计的因政府不作为而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表达歉意？她接见过为艾滋病病人的人权奔走呼号的高耀洁医生，但当高医生被河南地方官僚监禁和侮辱的时候，她本可出面干涉，却不闻不问，使得高医生不得不以八十高龄出走美国。

此次“乌龙”事件，生动地说明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了谎言笼罩每一个角落的谎言帝国，变成了“假商品”无处不在的制假帝国——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论文、假处女膜乃至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假针头，没有制造不出来的假货，没有不敢流通的假货。这不是政府的失职又是什么呢？温家宝政府有能力实现禁书、封网、打压异议人士，却对如洪水般泛滥的冒牌货物和商品束手无策，这不是故意的“一手硬一手软”吗？

### 作为法盲的司法部长吴爱英

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的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讲这段话的人无疑是一个法盲。让法盲来担任司法部部长，这就是今天中国无比荒诞而又真实的现状，这也表明了作为总理的温家宝的失职与无能。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不会有所谓“敏感案件”的说法，因为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案件，在宪法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敏感”与“不敏感”之差别。单单将某一些案件孤立出来，纳入到律师参与辩护的禁区之中，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的粗暴践踏，何谈“依法治国”？

在今天的中国，“敏感案件”实在太多了，为刘晓波、陈光诚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和法轮功修炼者辩护，是敏感案件；为死于毒奶粉的婴儿的家长和死于四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学生的家长提供法律援助，也是敏感案件……于是，涉足“敏感案件”的律师便成了“敏感律师”。

那么，这些“敏感律师”的下场如何呢？吴部长的这篇讲话处处暗含杀机，“要健全律师执业准入、执业状况评价和执业奖惩机制”，也就是说，不听话的律师，便会被敲掉饭碗，便会遭到秘密警察的监视、骚扰乃至殴打，便会被官办的律师协会以及司法局刁难甚至取消律师执照。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仅北京一地便有五十多名律师因“年检”没有过关，而被终止

执业。

我在访问台湾时，与若干当年承办过人权案件的律师、后来成为党外运动中坚力量的前辈有过接触。他们告诉我，即便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像今天的共产党政权那样，对律师群体展开如此卑劣的迫害。对于法律的尊严和荣誉，国民党当局还有三分的敬畏之心；而在彼岸的中国大陆，共产党人一向如毛泽东所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反正法律是他们一手制定的，他们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就不遵守，谁敢有怨言呢？

吴爱英部长便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之典范。在讲话中，该部长根本不提及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反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律师队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确保律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换言之，就是党大于法，当党的利益与法的权威发生矛盾时，要以党为大、枉法媚党。既然党无所不在，律师界又怎能让党缺席，所以要“坚持不懈的抓好律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覆盖”。这不仅是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遵循的“潜规则”，也是律师不得不烂熟于心的紧箍咒。

胡温执政以来，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不进反退，从严管律师到掀起“严打”运动，法律成为“维稳”的工具。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但从温家宝到吴爱英，均不信仰法律。在今天的中国，宪法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被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而已。温家宝和吴爱英根本无视这样一个常识：律师不独立，司法就不独立，一个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社会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 “玉娇挥刀”与“鸿忠抢笔”

看到这个题目，看官莫误会我在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我是在写本来索然无味的“两会”上出乎意料地上演一出精彩话剧。日光之下无新事，中共自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两会”，从来都平淡如水。那些习惯于说“假大空”的废话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有百分之九十是现任的或退休的官员。所以，“两会”历来既与人民无关，也与新闻无关。

在二零一零年的“两会”上，惟一引起草民关注的事件，不是温家宝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告和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承诺，而是“玉娇挥刀”与“鸿忠抢笔”两个新式成语。

玉娇者，邓玉娇也，为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一洗脚城的服务员。刀者，修脚刀也。野三关镇，镇如其名，似乎本来就是一处化外之地，不在温家宝的统治之下。这里的十二品小官，却个个是为所欲为的土皇帝，酒足饭饱之余，居然想强暴无辜的邓玉娇。为反抗淫官的施暴，弱女子邓玉娇怀着同归于尽之心，以修脚刀格杀之。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她最终获得从轻发落，这也算是近年来民意的一次罕有的胜利。

鸿忠者，李鸿忠也，为湖北省省长。笔者，录音笔也。三月七日，湖北代表团向媒体开放，李鸿忠步入贵宾厅接受采访。李巡抚洋洋洒洒，大谈湖北发展势头良好。《京华时报》（属人民日报系统）女记者刘杰最后发问：“省长，您怎么看待邓玉娇？”李鸿忠勃然大怒，脸色阴沉，怒视女记者。然后，猛伸出魔爪，夺其录音笔，“你是党报的！党报怎么舆论导向的？我找你社长去。”女记者遭此辱骂，唯有以泪洗面。

一夜之间，此消息传遍大江南北。统治湖北数千万民众的李鸿忠，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没有想到这一次却成为众矢之的。“鸿忠抢笔”成了一个网民创造的汉语新成语，与“正龙拍虎”、“秋雨含泪”、“兆山羡鬼”等并列，未来一定可以收入汉语词典当中。

紧接着，数千网友发起罢免李鸿忠的联署信，民众在网上呼吁罢免省长，自中共建政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李鸿忠抢笔之举乃是一时失态；而在我看来，这才是他的“常态”，而非“失态”。独立评论家冉云飞指出：“李鸿忠这种官员面对媒体时的拙劣表演，不是他个人的独得之秘，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带来的傲慢，对他们长年累月浸润到骨血里的结果。”

中国的官僚们要明白权力受限、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从江泽民用英文怒斥香港记者张宝华“年轻、愚蠢、无知”；再到前广州市长林树森呵斥香港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并警告说不要把香港那一套拿到内地来；接着郑州规划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再到广州路政官员用粗话应对记者：“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中国特权阶级之蛮横粗暴，堪称世界第一。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总理大人的话音未落，身为封疆大吏的李鸿忠便给了上司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不罢免公开与之作对的李鸿忠，温家宝这个总理如何继续干下去呢？

然而，李鸿忠仍然安居其位。在二零一零年夏天中南部抗洪抢险的会议上，温家宝在台上侃侃而谈，李鸿忠就坐在第一排侧耳倾听。温家宝看到戏班子中的这个不称职的配角，不知是“怒其不争”，还是“哀其不幸”？

文字版连载（待续）